

葛蘭西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

原著：(英)詹·約爾

譯著：黃丘隆 結構群

目 錄

序 論.....	1
第一章 出 身	1
第二章 社會黨.....	13
第三章 工廠委員會運動.....	23
第四章 共產黨.....	35
第五章 法西斯主義.....	45
第六章 里昂提綱和南方問題.....	57
第七章 監 獄.....	63
第八章 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	69
第九章 知識分子；馬基維利；"文化霸權".....	85
第十章 現在和未來.....	105
葛蘭西年表.....	121
書目提要.....	125

序論

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合著「共產黨宣言」時，滿懷信心地預言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末日，這一末日至今尚未到來。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經濟衰落期間，在1918-1919年，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期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以及在最為晚近的1973年，許多人都曾預言資本主義的危機迫在眉睫，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秩序土崩瓦解。而資本主義在世界許多地方的生存，尤其在那些工業最為發達的國家的生存迫使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去解釋資本主義本該早就從它的頂峰走向滅亡，為什麼它還會繼續存在的問題。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至今尚未成功地給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之所以具有出乎意料的重要性，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儘管他政治上失敗了，他的著作十分零散、艱澀——他提出了兩個理由以闡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強大，並指出在舊制度似乎仍具有強大威力時，革命運動可以取得進展的方法。

"誰真正試圖追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探索和研究呢?"當代法國馬克思主義者路易·阿都塞(Louis Althusser)寫道:"我只能想到葛蘭西。"⁽¹⁾在葛蘭西的思想中,阿都塞尤為注重的方面是葛蘭西對社會上層建築和作為基礎的經濟力量的關係的研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後者決定著這種關係。葛蘭西拒絕承認布爾什維克理論家布哈林所代表的那種粗糙的辯證唯物主義,他試圖依據這樣一種方法,即承認思想對歷史的影響和個人意志的推動作用來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強調理性和文化的影響而不是純經濟力量的影響使葛蘭西創造了另一種內容的"文化霸權"(Hegemony)⁽²⁾概念,至今人們仍認為,這是同葛蘭西關係最為密切的概念之一。這一概念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一個特定的社會和經濟體制如何保持其勢力並獲得支持。葛蘭西根據某種方法認識到,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不僅僅依賴經濟的和物質的力量,更要依靠說服被統治階級接受統治階級的信仰體系並接受他們的社會、文化和道德的價值觀念,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則幾乎不了解這種方法。

由於葛蘭西強調了社會關係中的文化因素,因而使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占有顯著地位。二十世紀其他馬克思主義者,

1 路易·阿都塞:「保衛馬克思」(倫敦1964年),第114頁。

2 Hegemony另譯為"支配權"、"領導權"等等,而葛蘭西文化霸權概念所指涉的內容涵蓋面甚廣,如:集體意志的形成,知識份子和黨的角色,政治教育的藝術,政治鬥爭的策略,國家統治的藝術和文化霸權過去歷史經驗的反省等等。

諸如托洛斯基本人對於藝術和革命的關係有著深厚的興趣;而試圖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則是葛蘭西同代人、且廣為人知的喬治·盧卡奇所著重從事的工作。但是,同托洛斯基相比,文化、教育和哲學問題是葛蘭西思想和實踐中更為核心的問題,同時,他又比盧卡奇更為直接地捲入了政治實踐和組織活動。

由於葛蘭西強調政治領導必須基於文化和道德上的領先地位,同樣也基於經濟上的優勢,因而導致他思考當今西方社會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人必須思考的另外兩個問題。葛蘭西把知識分子作為革命運動的中堅,這毫無疑問使他的著作深受西歐和其它地區的知識分子的歡迎。並且,葛蘭西也許比其他馬克思主義領導人(除馬克思本人外)都更為深入地研究了歷史。從歷史研究中,他認識到,知識分子中的傑出人物在社會及政治體制的鞏固中,就像中世紀天主教教士一樣,是最根本的力量。由於葛蘭西強調在保持政治制度的穩定性和發動革命變革中,傑出人物具有重要作用,因而,他又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考察了政黨的作用。鑒於列寧在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中曾強調共產黨對群眾之領導的重要性,鑒於他相信黨是無產階級真正的階級意識的體現,並且,只有這樣,黨才能以整個階級的名義行使其專政,因而,葛蘭西更關心讓群眾參與黨的政治決策並賦予"無產階級專政"這一詞彙以不同的側重點。儘管葛蘭西沒有解決領導和被領導、黨和群眾的辯證矛盾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但他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也使他對那些在列寧政黨思想指導下的史達林暴政統治中飽受動亂之苦的人民又一次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面對史達林及其繼承人以馬克思、列寧的名義所做的一切，許多西歐馬克思主義者致力於發現另外一個馬克思主義傳統，以回歸到這一傳統中來。他們急於掌握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以便發現另一個馬克思，這個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和同黑格爾唯心主義傳統的聯繫還沒有被他晚期著作中嚴酷的經濟決定論所掩蓋。他們回復到羅莎·盧森堡是由於她強調群眾的自發革命行為的必要性；他們或是回復到本世紀二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作家，諸如卡爾·科西 (Karl Korsch)⁽³⁾，那是由於他宣揚分散革命運動的必要性，並宣揚必須使這種革命立足於所有工人都可以參加的工廠委員會基礎之上。他們進一步考察了中國針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理想化的修正，而（修正後的毛澤東思想）同當代中國的實踐幾乎沒有什麼聯繫。他們試圖根據托洛斯基的著作創造一種系統的意識形態，並通過強調托洛斯基對史達林官僚主義的批判，試圖暗示他似乎是一位比其他布爾什維克領袖更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革命家。葛蘭西的著作對上述內容論證尤豐。他對那種較為粗糙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攻擊，他對歷史的複雜性以及文化因素對於歷史變遷的作用的認識，他在1919-1920年都靈工廠委員會運動中致力於發現一種可以把有效的領導同廣大群眾的真誠合作結合起來的新的革命組織形式——上述這一切都表明應該如何採取同史達林不同的方法來運用馬克思和列寧的原理。

此外，葛蘭西是義大利共產黨的奠基人之一，在他逝世後四十年裡，即使有時是相互矛盾的，但他仍舊經常被引用以支

3 Karl Korsch (1886-1961) 德國共產黨員，「馬克思主義與哲學」(Marxism and Philosophy) 為其重要代表著作，科西與盧卡奇 (Lukács)，葛蘭西同被譽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先河。

持（義大利共產黨）這個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共產黨之成功的路線和當時的各項政策。上述事實也說明他的著作可以回答一個群眾性的共產黨何以才能在非共產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中起作用。對於一個革命黨來說，存在著如何在民主制度中發揮作用等一些特殊問題。如果該黨欲吸引和保持群眾的支持，它就必須提出一個可以使它的支持者直接獲得好處的先進的政治綱領，同時還必須提供新社會最終圖景，此外，它還必須能夠使黨的積極分子每日每時都懷著革命必將最終取得成功的希望。葛蘭西的許多最重要的概念，諸如"文化霸權"的思想，這一思想闡明了一個階級如何建立其獨立於直接的政治力量之上的文化和道德的優勢；又如"積極的" (active) 革命和"消極的" (passive) 革命之區分，所有這一切都似乎旨在提出一些方法，正如本世紀二十年義大利共產黨所做的那樣，依據這些方法，即使不能實際執政，也可以擴大其影響，加強支持它的力量。葛蘭西不僅提出（存在著）比用於論證官僚專政和殘酷的蘇維埃制度的理論更為人道、更為多樣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可能性，他也提出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中，共產黨如何才能真正有希望獲取權力。

如果說葛蘭西在義大利共產黨早期活動的政治經歷中洞察了如何吸收黨員以組建群眾性的政黨的問題，那麼，在他入獄直到結束其生命的囚禁生活期間，他被迫反省上述經歷，則使他同馬克思主義或非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相比較都獲得了不同凡響的歷史和哲學的思想內容。馬克思主義者可以從他的著作中發現迄今仍然適用的關於政治組織和政治實踐的學說；而非馬

克思主義者則不僅可以從葛蘭西的著作中發現有關歷史的過去和今天、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關係的許多原始思想，而且也可以找到有關文學或教育的論述。他用自由知識分子可以理解的方式向他們提出了一個挑戰，儘管他仇視那個造就了他本人的思想傳統，但他似乎有可能在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間架設一條相互溝通的橋樑。

此外，與某些馬克思主義者不同，葛蘭西還是一個十分優秀的作家。他早期對文學及語言學的研究不僅在其思想方法和精神活動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同時也在寫作風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新聞評論之辛辣、「獄中札記」之精美、豁達，更為凸出的是他生動感人的個人生活記實——「獄中來信」，在這裡，他記錄了他的痛苦以及為超脫這些痛苦在精神上所做的努力。所有這些使得葛蘭西在二十世紀文學史及政治思想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作為一個作家，其著作不僅被那些致力於尋求新的方法，以便把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於當代歐洲社會的人們繼續閱讀著，而且任何一個關心歷史起源或希望對二十世紀的悲劇和成就做出新的洞察的人也都在繼續閱讀他的著作。

二

安東尼奧·葛蘭西生於1891年，卒於1937年。在其四十六年的生涯中，他經歷了十幾年的學生生活，其後在都靈成為活躍的政治評論家。在墨索里尼殘酷的法西斯主義統治的最酷年

代理，有五年時間他是義大利共產黨的領袖之一，最後十年是在法西斯監獄中，或者說是在病房中渡過的。在病房裡，儘管他已瀕臨死亡，但仍被嚴密監視。在彌留之際，這個生命就代表著痛苦、摧殘和失敗。但在他逝世後的十年裡，由於義大利共產黨作為戰後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而出現，葛蘭西的著作因而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在過去三十多年裡，他是最令人感興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並贏得了國際聲譽，許多人還把他視為繼列寧之後歐洲最重要的共產主義理論家。

在葛蘭西的生活中，思想和行動是密不可分的。"我的整個精神結構就是論戰性，"他在獄中寫道，"因而，對我來說，從事'無關痛癢'的思考或為研究而研究都是不可能的⁽⁴⁾。"同時，他一直注意根據歷史和社會的一般理論去分析自己以及他人的政治活動，並且只要他迅速惡化的健康狀況和嚴酷的環境能夠允許，他就利用其囚禁時被迫停止活動的數年將其政治活動的經驗吸收到更為廣泛的歷史和哲學框架中。

儘管由於被捕入獄，葛蘭西的生活遭到決定性的衝擊，但他的思想仍然令人矚目地發展著。雖然像所有政治活動家一樣，葛蘭西的思想也幾經改變，並且許多時候也自相矛盾，但是，他的核心思想和基本態度卻一直貫穿於他生活的始終。

從另一方面來說，葛蘭西的這種生活環境也迫使他無法留下任何一部完整的理論著作。從1914年10月葛蘭西第一篇署名

4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來信」（紐約，1973年版）第139頁；（都靈，1965年版）第390頁。

文章發表之日起到1926年11月8日他被捕入獄為止，他的文章都是為有關報刊雜誌寫的報導和評論文章，大多數文章的篇幅都不超過一兩頁，在獄中，當他進行範圍廣闊的思考時，在多數時間裡，他的身體極度衰弱並倍受監獄條件的限制，以至於無法寫出篇幅稍大的文章。此外，雖然有時也存在某些未署名文章的歸屬問題，但葛蘭西的報刊文章發表日期仍十分準確（其中大多數已集成文集並出版）。可是他三十二卷的「獄中札記」則不同，儘管1975年出版了由學者編纂的繕本，但札記的寫作日期和對它們的解釋仍存在很大爭論。

圍繞著對葛蘭西著作的出版和解釋問題進行的熱烈的政治討論，使得學者對葛蘭西著作的編纂成為日趨複雜的問題。自墨索里尼下台，義大利共產黨東山再起，直到1964年帕爾米羅陶里亞蒂（Palmiro Togliatti）逝世，其間，葛蘭西學生時代這位親密伙伴和朋友一直充任該黨的領袖，他自然急於運用葛蘭西的著作來論證黨的日常策略，一如他常做的那樣。葛蘭西是共產國際的忠實追隨者，如雖持某種懷疑態度，但仍然參加了對托洛斯基的譴責。但毋庸置疑，他的許多思想，尤其是「獄中札記」裡的思想同本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期間正統的史達林路線勢不兩立。正如E.J.霍布斯鮑姆（E.J.Hobsbawm）所評論的那樣：事實上，葛蘭西"由於歷史的某種諷刺，亦即由於被墨索里尼投入囚籠之中，才把他從史達林的手中解救出來。"⁽⁵⁾而另一方面，陶里亞蒂在莫斯科流放生活中養成了關

5 E.J.霍布斯鮑姆：「偉大的葛蘭西」見「紐約書評」1974年4月，第21卷，第5號。

於什麼是可說的東西，或什麼是不可說的東西之高度敏銳的政治意識，因而才生存下來；並且，義大利共產黨當局對葛蘭西思想加以解釋，並開始顯示這些思想的真正深刻性和複雜性也只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正由於葛蘭西被用來論證當代義大利共產黨的策略，因而，運用這些策略的左、右派批評家們都急於在他的遺著中尋求支持。對葛蘭西的解釋和再解釋在義大利已成為知識界的巨大任務。在羅馬，有葛蘭西研究中心，各種有關會議討論著他的觀點；有關他的著作和文章浩如煙海，並在穩定增加。義大利域外之異邦也想掌握他的著作，以用來指導當今革命的政治活動。此外還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當某些人感到他們可以要求享受發現這一鮮為人知的思想家之榮譽時，葛蘭西的一些解釋者對"他們的"葛蘭西的佔有欲就變得愈發強烈，並憤怒地批評其他企圖染指葛蘭西的人們。

由於葛蘭西著作的零散性、不完整性和艱澀性，他作為一個思想家引起了人們足夠的興趣，並承受許多相互爭議的解釋。葛蘭西真正致力於解釋並變革他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即使在後一方面他失敗了。他還提出了認識歐洲歷史及二十世紀社會的許多新方法。在他的生活中，尤其在他身陷囚籠和病入膏肓的年代裡，他以斯多葛（Stoicism）⁽⁶⁾精神鼓舞自己，在哲學上取得了成就，他是我們時代知識分子中真正的英雄。

6 斯多葛哲學在古希臘羅馬時興起，鼓勵人們參與人類事業，相信一切哲學探究的目的都在於給人提供一種以心靈平靜和堅信道德價值為特點的行為方式。當代哲人中注重人和整個宇宙有緊密和本質的聯繫及理性的作用，這些都是斯多葛哲學留下之傳統。

第一章 出身

安東尼奧·葛蘭西出身於義大利最貧窮落後地區的一個非常貧困的家庭。他生在撒丁，在他二十歲獲得都靈大學學士學位之前，他一直生活於此。其父生於一中產階級家庭，他從義大利本土遷居撒丁，在一機關中謀到了一個小職務——地產登記處職員⁽¹⁾。其母為撒丁人，生於一小農和小官吏家庭。葛蘭西就生長在一個南部鄉村的小資產階級家庭，該階級的命運及政治行為將成為他後來政治思想中主要關注的對象。起初，儘管根據撒丁人的標準，這個家庭還算比較富足，但當葛蘭西七歲時，全家遭受了一場滅頂之災。其父由於被指控為侵吞公款而銀鐐入獄，被判處監禁五年，當他出獄時已無職業。結果，安東尼奧·葛蘭西及六個兄弟姐妹都在極度困難的境遇中長大，家庭經濟十分拮据。他十一歲時離開了鄉村小學，在地產登記處打零工，三年後，其父母設法送他進了一所中學，儘管這所學校的教師就像他後來回憶的那樣都是些“不值錢的貨色”⁽²⁾。後來，他又轉入撒丁首府卡利亞里的一所文科學校，他同正在那裡做工的哥哥共同生活。1911年，他爭取到了獎學金

見朱瑟佩·費奧里：「安東尼奧·葛蘭西的一生」（巴里，1965年版）。

見朱瑟佩·費奧里「安東尼奧·葛蘭西的一生」。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葛蘭西 2

，後進入都靈大學學習。來自撒丁的帕爾米羅·陶里亞蒂也同時考上這所大學，該人後來成為葛蘭西最親密的政治盟友。

葛蘭西二十歲時遠離家鄉求學既標誌著他自己對知識的高度熱情和遠大抱負，也標誌著他的家庭所做出的犧牲，尤其是他的母親，一位稟性不凡，又粗有文化的女人，儘管生活艱辛，義大利地方教育制度又不完善；但這個家庭仍準備讓葛蘭西受到他應受的一切教育。也許，這也是尊重知識成就的標誌。這種對知識的尊重，即使在義大利這個最落後的地區也可以發現。葛蘭西能得到教育不僅以個人和家庭的犧牲為代價，也在於他不顧自己不健康的身體，以及阻礙其發育並使其畸形的駝背才取得成功。

毫無疑問，這些經歷把年輕的葛蘭西造就成了革命家。他兒時生活過的撒丁提供了大量的農民起義事例，其反抗形式常常具有替天行道的色彩。在該島西南也經常發生礦工騷亂。如果說葛蘭西的命運不濟，那麼，許多撒丁人的命運就更為艱難。在都靈的一次罷工中，葛蘭西同一個參與鎮壓該城騷亂的撒丁新兵談話時，這位新兵拒絕承認這些罷工工人是窮人，他告訴葛蘭西："我了解窮人，知道他們穿的是麼樣子。"⁽³⁾義大利南部鄉村及其諸島的窮人狀況比產業工人狀況要糟糕得多，這一點葛蘭西永遠也不會忘記。葛蘭西著作中一個不斷出現的

3 見安東尼奧·葛蘭西「南方問題」，第140頁（羅馬，1970年版）。

論題就是城市和農村的對比，二者之間的辯證的相互作用以及都市工人階級和農民的政治關係。

葛蘭西深深地植根於撒丁，不僅因他早年在該島親身經歷了貧窮，目睹了社會的不公正，也因為他總是關注故鄉落後社群的鄉土文化。他迷戀撒丁人的方言、撒丁的民間詩歌、故事、以及它的語言淵源。他很早就對語言研究產生興趣，這一興趣由於在大學期間對語言的研究而有增無已，但是，這一興趣總是同他所研究的語言和文學的社會根源及背景相聯繫。撒丁的局勢也總是提醒人們想起義大利曾經有過的表面上的聯合，以及至今對義大利各地區真正統一所產生的影響。在他後來的著述中，他曾屢次回溯義大利十九世紀復興運動(Risorgimento)時代，以及義大利王國的形成，以便認識後來使義大利動亂半個多世紀之久的社會衝突的性質。

1911年，葛蘭西為獲得獎學金赴都靈參加考試，這是他第一次來到義大利大陸遊歷現代工業城市。在他給家中的信中寫道："避開無數橫衝直撞的汽車、電車，僅走了一小段路，就使我心驚肉跳。"⁽⁴⁾但不久，他就覺察到這一城市政治上的活動及歷史的重要性：

"僅就現代一詞最原本的歷史意義而言，它是一個現代城市。在這裡，所有仍在瓦解義大利資產階級社會的中世紀垃圾正在被清除，這些垃圾大半已被除淨。那些緩和社會衝突的舒服的彈簧座墊由於堅強戰鬥的無產階級組織的迅速而頑強的產生，被拋到廢品站裡去了。作為這一時

4 見朱瑟佩·費奧里「安東尼奧·葛蘭西的一生」第70頁。

期歷史特徵的整體的、自覺的階級鬥爭在都靈已經形成。
„(5)

如果說他本性中保留下來的撒丁地方觀念這部分被都靈的奢侈、浮華以及荒淫無度的娛樂所震驚的話——不久，他便從事戲劇批評，抨擊商業戲劇，並發現了易卜生（Ibsen）和皮蘭德洛（Pirandello）的著作——那麼，他本性的另一部分則為這座大城市之生機勃勃的魅力所感染。

這一切是葛蘭西及其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的共同經歷。他們被新世紀中持續發展的工業革命和技術進步以及把義大利從落後的社會轉變為先進社會的可能性所激勵。葛蘭西非常同情"未來主義運動"(Futurism)⁽⁶⁾的作家和藝術家的反偶像崇拜主義，也同情他們為建立新的文化去摧毀舊的文化。1921年，葛蘭西在回顧這場運動時寫道：未來主義者"有一個清晰的、定義明確的概念，亦即，我們這個時代——工業時代，偉大的工人階級城市時代，緊張而動蕩的生活時代——必須有新的哲學和藝術形式，新的社會習慣和語言形式..."⁽⁷⁾他同未來主義者一樣確信義大利必須向二十世紀機械化時代飛躍。葛蘭西似乎從中學時代起就了解一些馬克思的著作，從馬克思那裡，他認識到工業化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之先決條件的必然性。當他談到都靈最重要的企業——菲亞特汽車廠的奠基人阿格奈利（Agnelli）及其同時代的工業主義者時，他寫道：

5 見「前進報」，1916年5月17日「前奏」一文。

6 未來主義：廿世紀初的藝術運動，以義大利為中心，強調動勢和革命。

7 見「新秩序報」1921年1月5日「馬利奈蒂是革命者嗎？」一文。

"我深深地敬佩這些人。他們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統治者，是比其它時代以及我們這一時代的那些君主更為強大、更有作為的君主。正是這些人把那些無知、狡詐的鄉下人從平靜、被動的慵懶生活中清理出來，把他們縛到我們時代之工業文明這一光彩奪目的十字架上……阿格奈利是工廠的奠基人，他也奠定了使工人成為社會主義者的必要條件。"⁽⁸⁾

葛蘭西後期許多思想都只能被理解為同他個人的生活背景相對立——這些背景包括他的撒丁出身，他親身經歷的極度貧窮，他同城市及都靈工人階級之間的衝突。而同時，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義大利知識分子的思潮中，在義大利社會黨（Italian Socialist Party）——不久後，葛蘭西及其同學，著名的帕爾米羅·陶里亞蒂和安琪羅·塔斯卡（Angelo Tasca）便同該黨發生了聯繫——的活動中才能得到理解。

那時，在義大利知識界最有影響的是生於1866年的哲學家本尼德特·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自1893年他發表「蘊含在藝術概念中的歷史」一文以後的一系列著作中，他抨擊了實證主義者對自然科學方法的信仰並宣揚在歷史變革和藝術創造的鑒賞中主觀及直覺想像的理解方式的重要性。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克羅齊經歷了深入研究馬克思的時期，通過對馬克思的研究，導致他向黑格爾哲學興趣的復歸。在這二位思想家一

8 見「前進報」1961年5月8日「和平的領域」一文。

——他們提出了歷史是擁有自身發展規律的無所不包的過程的概念——之前，展現在克羅齊前面的是十八世紀早期偉大的義大利思想家伽姆巴蒂斯塔·維科 (Giambattista Vico)。同克羅齊一樣，維科也是拿波里人。維科不僅把歷史看作在不變規律作用下運動的循環過程，而且相信歷史研究包括著人類思想和人類社會所有方面的研究。至十九世紀末，維科已成為世所公認的歷史主義思想方法的重要先驅。克羅齊編纂了維科的主要著作「新科學」，克羅齊和葛蘭西二人都深受維科的思想及語言的影響。

克羅齊既批判黑格爾和馬克思，也向他們學習。黑格爾堅持歷史是人類精神的歷史，是人類思想的發展過程，而不是其物質條件的發展過程，而這些條件則為理解歷史提供了鑰匙。在這一方面，克羅齊與之更為一致的是黑格爾而不是馬克思。另一方面，克羅齊看到歷史的變遷只有依據個人和具體情境才能得到理解，他一直保持著對歷史活動中特殊性的意識，也一直保持著對形成每一時代的時代精神之各個要緊的特定結合方式的意識。他是偉大的自由主義傳統的代表，他同黑格爾一樣確信歷史是自由的歷史，人類歷史發展的鏈條中，每一發展階段都以人類潛在自由的進一步實現為標誌。在克羅齊的著作中，尤其在後期法西斯主義者統治時期所寫的著作中，自由主義和對無限的世界精神的信仰相結合，常常導致一種十分空洞且又崇高的信仰，即有朝一日，一切都會變好。但不管怎麼說，對於1914年以前的義大利青年知識分子來說，克羅齊的哲學給歷史研究賦予了意義和道德目標，也使人們意識到從過去到現

在的持續聯繫。此外，克羅齊的歷史觀點包括了全部人類行為——藝術、經濟、哲學——因而，研究歷史就是研究生命的全部。

在都靈大學學習文學和語言學的年輕的葛蘭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克羅齊這些觀點的影響，也受到十九世紀偉大的文學史家弗朗西斯科·德·桑科蒂 (Francesco de Sanctis) 的影響，對於桑科蒂來說，對文學之研究深深地根植於對社會及思想史的研究中。儘管葛蘭西逐漸承認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但他也從未擺脫上述影響。在葛蘭西的一生中，可以說他一直在同克羅齊進行對話。值得注意的是，「獄中札記」的一些最長的文章都是在討論克羅齊的哲學。葛蘭西從克羅齊那裡學到一種信仰，相信歷史是支配著和包含著道德、政治、藝術的精神活動，是聯繫過去與現在以及現在與未來的途徑。從克羅齊那裡，他認識到了實證主義的局限性，並且一如他後來在批判布哈林論述歷史唯物主義時所表明的那樣，他也認識到那種對當代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傳播的歷史唯物主義之粗糙形式的缺乏，他還具有比同時代許多社會主義者深刻得多的文化概念。

然而，葛蘭西也同時深刻地批評了克羅齊，這不僅是因為克羅齊批判了馬克思主義，隨著時間的推移，克羅齊逐漸站到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而且也因為，作為義大利知識分子，並且事實上也作為歐洲自由主義代言人的克羅齊是一個主張自由民主制度的哲學家，而葛蘭西從學生時代起就逐漸增強了對這種制度的敵視，他也厭惡克羅齊拒絕像他那樣承認哲學必須也必然導致政治行動的看法。克羅齊的哲學仍然是思辯的----

一種精神自我設定的哲學。而馬克思主義，按造葛蘭西的術語來說，則是一種"實踐的哲學"(Philosophy of Praxis)，是一種以實踐行動為標準的哲學，葛蘭西稱讚克羅齊思想的廣博和輝煌，並欽佩其學說中所謂歌德(Goethean)式的那些成就。正如葛蘭西所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知識分子都喪失了理智...否認他們的過去...而克羅期卻依然冷靜，保持著靜穆和對信仰的肯定，他相信，'抽象地說，罪惡不能消除。歷史是理性的'"⁽⁹⁾。但是，這種崇高的超然態度和超越鬥爭的觀念也可以導致拒絕承擔責任，葛蘭西稱這種超脫為龐蒂皮浪主義(Ponziopilatismo)，亦是龐蒂烏斯(Pontius)和皮浪(Pilate)的處世態度。

儘管葛蘭西批評了克羅齊，但他仍舊感謝克羅齊。正如馬克思顛倒了黑格爾哲學並把他選用於自己的目的，葛蘭西也以同樣的方式對待克羅齊。他強調，馬克思的哲學和克羅齊哲學共同之處在於，"就我看來，'實踐哲學'是將黑格爾主義翻譯成歷史主義的語言，因而克羅齊的哲學則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將實踐哲學再譯為思辯的語言"⁽¹⁰⁾。這種思辯成份是克羅哲學的弱點，但這兩個體系(實踐哲學和克羅齊哲學)的共同之處就在於他們都企圖解的一切基本問題，葛羅西對這些問題視為歷史變遷和人類發展中的基本問題。以某種程度上，"他在獄中的一封信裡寫道，"我們都屬於義大利從本尼德·克羅齊開始

9 引自「獄中札記」1975年版，第1216頁。

10 「獄中札記」第1232-1233頁。

的道德和理性改革運動中的一部份，克羅齊的第一個前提就是能夠也應該脫離宗教的幫助去生活——我的意思當然是脫離天啓宗教⁽¹¹⁾、實證主義宗教、神話學的宗教，或任何名義的宗教。⁽¹²⁾

此外，克羅齊還指出了歷史變遷的諸因素，這對葛蘭西自己的革命理論來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他在獄中寫道："克羅齊的思想至少必須作為一種有價值的工具來欣賞，因而，可以說，他將著眼點有力地指向歷史發展中的文化和思想事實，指向偉大的知識分子們在文明社會和國家的有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上..."⁽¹³⁾不幸的是，這種尊重並不是相互的。當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葛蘭西「獄中札記」第一卷出版時，年逾八十，依舊在義大利占統治地位的克羅齊則將該書視為"草率提出的、徘徊不定的思想，常常是毫無根據地自我疑惑、猜測和懷疑... (缺乏)區別、建立和統一為整體的思想綜合的力量。"⁽¹⁴⁾但是，儘管如此，克羅齊的聲明——他的特點就是在做聲明時搖擺不定——"葛蘭西是我們的一員"依然是正確的。

如果說克羅齊創造了歷史主義的框架，葛蘭西則試圖在這個框架內改造馬克思主義思想，使之適應二十世紀義大利的形勢，那麼，知識界許多其它影響也作用於這位在都靈大學就學

11 朱瑟佩·費奧里：「安東尼奧·葛蘭西的一生」，第74頁。

12 「獄中札記」第1235頁。

13 「獄中札記」1948年版第78-79頁；見榮根尼奧·加林的「義大利文化中的安東尼奧·葛蘭西」。

14 天啓宗教是印度宗教之一。

的年輕的撒丁學生。就在這一時期，一些義大利社會理論家不僅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而且對義大利自由主義所存在的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分析。維爾弗萊德·帕里托 (Vilfredo Pareto) 和吉塔諾·莫斯卡 (Geatano Mosca) 二者都批判了議會制度，而帕里托則同時提出和撰寫了他的傑出人物論。正如葛蘭西後來所做的那樣，這些觀點是那些關注政黨的作用和性質的人們所必須思考的。弗里奇曼 (Frenchman) 和喬治·索萊爾 (Geoges Sorel) 的著作正在被義大利青年知識分子和政治活動家們所翻譯、閱讀和討論，這些人物中包括社會主義新聞工作者本尼特·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該人於1912年成為米蘭社會主義者報紙「前進！」的編輯，那時，葛蘭西剛剛開始同社會主義運動接觸。葛蘭西後來批判了索萊爾的工團主義追隨者，他們醉心於由工人當政的烏托邦幻想而對日常組織活動的任務沒有興趣，但同時，他也贊賞索萊爾所謂 "我崇拜的兩位大師的品德：馬克思的嚴謹的邏輯和普羅頓 (Proudhon) 激情澎湃的平民式的雄辯。"⁽¹⁵⁾ 並且他對索萊爾鄙視形式上的自由民主也抱有同情。索萊爾還堅持只有品德高尚的工人階級才必然可使社會復興，要執行這一使命，工人階級就必須對自身和自己的目的抱有信心。對索萊爾來說，正如對葛蘭西一樣，社會主義是包羅萬象的東西，是一種世俗的宗教，尤其是一種新的文化。"下層階級"，正如索萊爾所說，"事實上並不注定要靠上層階級施捨給他們的殘羹剩飯為生。"⁽¹⁶⁾ "葛

15 未署名文章，「新秩序」報1919年10月第2期，合訂本1919年-1920年第460頁（都靈1954年版）。

16 引自列奧那多·帕吉「葛蘭西和現代原則：義大利社會主義及其危機」，第12頁（羅馬，1970年版）。

蘭西一直堅持認為，工人階級必須在文化及政治上做出特殊的貢獻，必須依靠自己的基礎和根基起作用。葛蘭西同索萊爾一樣贊賞羅馬天主教的方法，依據這種方法，天主教生存並保持其影響達數世紀之久；他還相信社會主義欲達到相當程度的成功，就必須立足於某種信仰的基礎之上，這種信仰將影響其信徒生活的各個方面。

欲討論葛蘭西學生時代的經歷及對後期思想所產生的影響，就必定面臨該時期他讀過多少馬克思著作的問題。馬克思的許多著作在馬克思生前就被翻譯成義大利文，到1911年，當葛蘭西上大學時，或是通過對克羅齊的歷史和哲學理論的討論，或是通過對帕里托社會學理論的討論，總之，義大利知識分子已廣泛地了解了馬克思的主要思想，同時，社會主義思想家安東尼奧·拉伯里奧拉 (Antonio Labriola) 自1904年逝世後成為那一代義大利人最感興趣的非德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也是一位廣為人知的作家，因此，馬克思的語言和思想已為所有年輕的義大利知識分子所熟悉。我們還知道，1914年至1915年間，葛蘭西選修了安尼巴爾·巴斯德教授 (Annibale Pastore) 主講的有關馬克思的課程，巴斯德教授後來回顧道：葛蘭西 "非常不安份，不知怎樣以及為什麼他必須從克羅齊的影響中解脫出來。"⁽¹⁷⁾ "但很可能僅僅幾年後，當葛蘭西開始其積極的社會主義戰士生涯時，他就真正成了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時，他已經能讀德文，假如我們參考他的「獄中札

17 見朱瑟佩·費奧里「安東尼奧·葛蘭西的一生」第92頁。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葛蘭西 12

記」來下判斷的話，那麼，當他經常依靠記憶引用在獄中無法保存的原著時，（我們可以看到）對他影響尤為深刻的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對於馬克思的純經濟學理論，他似乎從沒有多大興趣。他尤為關心的是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以及從一種社會向另一種社會轉變的歷史契機問題。他經常引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話，在這段話中，馬克思說，社會任務在其取得成功的充分必要條件顯露之前是不會被該社會提出來的，並且，一種社會，在蘊含於其經濟關係中的所有生活方式得到充分發展之前也不可能解體並被取代。使葛蘭西感興趣的是歷史變革迫近的明顯標誌，而且尤為使他感興趣的是構成每一特殊社會之特征的文化和道德價值體系。

1911年到1915年期間，對於葛蘭西這個從外省來到都靈的窮學生來說，重要的並不是表現了他的思想寬度和閱歷，還有他第一次接觸戰鬥的社會主義組織以及接觸都市無產階級的日常問題。葛蘭西及其少數同學，包括陶里亞蒂和安格羅·塔斯卡，這些人後來成為義大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傑出人物，他們親眼目睹1913年春季長達三個月之久的汽車工人大罷工。同年夏季，葛蘭西返回撒丁島時，又目擊了自1911年選舉權擴大以來第一次議會選舉，也是義大利歷史上第一次有農民參加的選舉。"正是這次經歷"葛蘭西的朋友塔斯卡後來回憶道，"使葛蘭西最終成為社會主義者。"(18)

18 見朱瑟佩·費奧里「安東尼奧·葛蘭西的一生」第88頁。

第二章 社會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及其戰爭期間的一段時期裡，當葛蘭西在都靈就學繼而又作為記者開始發展其社會、哲學及歷史思想時，很自然地吸引了葛蘭西的義大利社會黨正剛剛開始其一系列的內部危機，葛蘭西後來對解決這些危機做出了努力。正如大多數歐洲社會黨一樣，義大利社會黨也分為改良派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集團。改良派認為黨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在現存的經濟法律框架中改善社會及工人的命運，而正統馬克思主義集團則相信歷史站在他們一邊，他們只需等待，只需增加其成員，改善其組織，提高其成員的階級覺悟，直到馬克思所預言的無產階級必然勝利的到來。在義大利，這些分裂又由於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的叫囂及義大利國家的野心勃勃這樣一些相互分歧的態度的存在而變得十分複雜。例如1911年，義大利曾捲入對土耳其的戰爭，以爭奪利比亞的北非省，一些社會主義者既以普遍的愛國心為理由，也由於他們確信殖民主義掠奪將提高義大利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並提供輸出剩餘人口的機會，因而，他們曾支持這場戰爭。其結果在黨內產生了分歧。同樣的情形在1914年大戰爆發時再次出現，當時大多數義大利社會主義者支持義大利中立，而黨內的一些著名人物，包括本尼特·墨索里尼則為保衛義大利而領導那次戰役，當時，義大利站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葛蘭西 14

在英、法一邊。實際上，葛蘭西在他1914年10月發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中，也對墨索里尼肯定戰爭的態度表示同情，因為，對無產階級來說，在這場危機中作為被動的觀望者是錯誤的。正如他多年後的一篇文章的開頭所說（這一思想實際上貫穿了他的一生）："我討厭中庸之道。"⁽¹⁾葛蘭西對墨索里尼訴諸行動的做法的反應，在他後期生活中經常遭致反對。

義大利工運的內部，正統馬克思主義和工團主義之間的分裂激化。對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革命鬥爭要採取政治鬥爭的形式，這就是說，他們確信為了奪取政權必須通過選舉和組織政黨，以便向舊的、以議會為基礎的制度發起挑戰；而工團主義者則信奉以罷工為工具的直接行動，他們譴責說，政治行動不過是以一套班子換取另一套班子的詭計。在義大利，無政府主義仍有很大影響。老牌的無政府主義者愛利科·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就是1914年6月"紅色週"（Red Week）罷工運動的領袖之一，這場運動使全國癱瘓。戰爭加劇了義大利的社會矛盾，其結果，也加劇了工人運動的內部矛盾。從1914年到1919年期間，葛蘭西越來越積極地捲入社會主義政治活動，因而也不可避免地捲入黨內的宗派鬥爭。更為重要的是，他表明了自己對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黨的正確的策略、義大利民族主義及國家的性質，尤其是對知識分子同革命運動的關係（這樣一些問題）的立場。

可以肯定地說，作為知識分子的葛蘭西在這些年代裡得到了發展。他繼續進行他的學術研究，尤其是語言學和文學。儘

管他身體不佳，且患有週期性的神經衰弱，但他仍作為記者開始積極活動，並越來越深地捲入了都靈的社會黨政治活動。1915 - 1918年這一時期，在葛蘭西所發表的文章中，人們可以對他的政治、文化興趣範圍和他對知識的渴求以及獨立不羈的精神有所了解。

葛蘭西早期發表的文章大多刊登在「人民呼聲報」（「II Grido del Popolo」）上，該週報發行額約1500份。像所有初涉記者生涯的人一樣，葛蘭西許多專題撰寫文章——諸如普通雜文、文學和戲劇批評等，隨著戰爭的發展，他開始為社會黨人機關報「前進！」都靈版撰寫文章。他立刻感到自己成了國際反戰運動的一部分——「人民呼聲報」為偉大的法國批評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開闢了一個專欄以批評交戰國政府的政策。同時，他也發現了一個世界性的文學領域。他認識到文學、尤其是戲劇的潛在作用所引起的強大的社會影響。易卜生和皮蘭德洛就是對發動革命做出了貢獻的作家。葛蘭西說："皮蘭德洛就是戲劇領域的凸出隊隊員，他的許多戲劇就是投入觀眾頭腦中的炸彈，它摧毀了那些陳詞濫調以及感情和觀念的廢墟。"⁽²⁾閱讀當代法國作家的著作並發現了英國文學，這些著作使他歡娛終生，儘管他的一些熱情在今天使我們感到吃驚。後來，在1917年，當他把科普林（Kipling）的「假如」（If）當作"反教士的經書"、當作"一個未被基督教精神污染而又可以為所有人接受的道德典範"翻譯出版時，他注意到，"切

2 葛蘭西：「文學和民族的生命」（都靈，1950年版），第370頁。

1 見「城鎮未來」1917年2月第2期，「描繪童年」（1914 - 1919年）第78頁。

斯特頓 (Chesterton) 是個偉大的藝術家，而柯南·道爾 (Conan Doyle) 不過是個平庸的作家”。⁽³⁾ 科普林的確深受葛蘭西青睞，「叢林札記」(The Tungle Book) 是葛蘭西後期生活中屢次引用的一部書。

對文化問題的強調也許部分歸因於戰時條件。即使葛蘭西的非政治性文章也被嚴重刪改，但他的早期文章則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主要見解。他說他信仰“整體的新聞學”。他認為把人類行為的一方面從它方面孤立出來是不可能的。像黑格爾一樣，他也認為時代精神的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導，批判和創造新的文化思潮就是革命的準備。正如葛蘭西所謂“資產階級精神國際”的出現引導著法國革命一樣，今天，社會主義運動也應起類似的作用。⁽⁴⁾ 葛蘭西一直堅持必須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對工人進行教育。他在1920年寫道：這種教育運動，

“旨在創造新的文明、新的生活和思想態度、新的感情，為做到這一點，必須提倡體力及腦力勞動的工人階級對哲學以及藝術領域、歷史研究領域、新的真和美的作品之創造領域的研究精神。這種性質的運動在第一階段裡，它是純粹的鬥爭工具，第二階段才開始積極地創造工作。”⁽⁵⁾

3 「獄中來信」，第370頁。

4 「社會主義和文化」，載「人民呼聲報」1916年1月29日，「描繪童年」第25-26頁。

5 未署名文章，1920年12月，見「新秩序報」1919-1920年，第493頁。

但是，這種新的文化不應是教條主義的和片面的。儘管葛蘭西像所有人一樣其判斷也可能是教條的、片面的，但他依然希望改變他的思想。這裡有個小小的例證：在獄中，他驚奇地得知，他的小兒子要讀「湯姆叔叔的小屋」——“一本多年前對北美店主產生很大影響的書”。他重讀此書並承認：“在眾多的老套子和人為的渲染中發現了一些相當驕悍的形象⁽⁶⁾。”1918年他寫道：“個人的文化生活愈寬，基礎愈紮實”，

“他的觀點就愈接近真理，這些觀點就能被所有人接受；擁有寬廣堅實之文化基礎的個人愈多，一般觀念也就愈接近真理——這就是說，應保持真理於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形式中，這種形式可能發展直至成熟和完善。應遵照這樣的原則，即使真理已經成熟和完善，它也不應表現於教條和絕對的形式中。真理，由於它可以被傳播，因而它就必須適應它的社會組織之歷史和文化條件。”⁽⁷⁾

也許葛蘭西從未解決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確定性同克羅齊的歷史相對性和主觀性的內在衝突，但至少他一生都對這一問題

6 「獄中來信」第791，808頁。

7 「書和思想以及思想和書」，載「人民呼聲報」1918年6月15日，「描繪童年」第216頁。

保持著清晰的認識。

事實上，葛蘭西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主要貢獻就是強調了文化及文化同政治關係的重要性。正由於這一點，他從未簡單地把觀念看作生產力的產物。這是葛蘭西關於基礎和上層建築，生產力和它所引起的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關係問題的思想，往後，我們還將回顧這一思想。葛蘭西正是把這種關係看作諸方面相互影響的辯證過程，用葛蘭西的一個最為著名的短語來說，它們結合成所謂"歷史的紐結" (historic bloc) (8)。

葛蘭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歷使他豐富了對文學和哲學的興趣，這一切給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以很大的影響，也有助於他後期在囚禁年代裡的寫作和思考。在這一時期，他的文風逐漸完善——犀利、辛辣，但比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更為清晰，比大多數義大利記者更為精確。當然，尤其是在這些年代裡，作為記者隊伍中的一員，他獲得了政治實踐經驗。這些記者面對戰爭所引起的困難，創辦了許許多多的政治報紙。葛蘭西力圖反映戰爭給都靈工人帶來的衝突，從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角度來（不局限於義大利）洞察這場戰爭的更為廣泛的含義。漸漸地，從1915年年底開始，儘管葛蘭西性情暴躁，身體虛弱，患有週期性抑鬱症，但他已開始在都靈社會主義者中嶄露頭角，他很快將自己同最激進的力量，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少數派代表聯繫在一起，這些人在1915年和1916年茲莫瓦爾德 (Zimmerwald) 和肯塔爾 (Kienthal) 會議上再次強調他們反對戰爭，並重申他們的革命信念。葛蘭西在1915年11月寫

8 徐崇溫先生譯為"歷史集團"。

道：對我們來說"——這種語言表現了一種對克羅齊和馬克思的特殊綜合方式——

"國際是一種精神行動，它是全世界無產者所具有的意識……儘管各民族有其不同的態度，但為了進行反抗，他們組成了一個集體，團結成爲一個力量的紐帶。國際的共同目標是以生產的因素作爲歷史動力來取代資本，並使至今還沒有歷史或只有潛在歷史的無產階級的迅猛暴動匯成浩浩蕩蕩的運動，這一運動會創造世界的生命。(9)

葛蘭西歡迎1917年2月的俄國革命是不足為奇的。也許值得驚奇的倒是他對布爾什維克黨及列寧的個性和思想的意義的認識速度。葛蘭西在1917年7月寫道：列寧"有能力將其思想轉變為駕馭歷史的力量。革命正在走向徹底的勝利，但距離將有可能取得的相對平靜時期還為時尚早。生活永遠是革命。(10) 在1917年前，義大利還沒有人知道列寧的著作，其著作逐漸從法國傳入義大利，刊登於伊斯特曼 (Max Eastman) 所創辦的一份名為「解放者」的美國刊物上。但對於托里尼斯 (Torinese) 工人階級來說，列寧的名字已經成爲一種象徵，當

9 「西班牙社會主義者大會以後」，見1915年11月13日，「描繪童年」第7頁。

10 「最偉大的蘇聯」載「人民呼聲報」1918年7月28日，「描繪童年」第124頁。

1917年8月彼得洛格勒蘇維埃代表團訪問都靈時，工人們高興地歡呼"列寧萬歲！"（但毫無疑問，這一口號並未取悅於該代表團，因為他們是孟什維克而不是布爾什維克）。據陶里亞蒂說，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列寧的單行本「帝國主義論」和「國家與革命」以及其它著作逐漸為義大利人所了解，可以肯定，到1918年，列寧已經對葛蘭西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十月革命強烈地吸引了葛蘭西，不僅是因為它是一場成功的革命，還因為他認為十月革命為義大利提供了一個可以遵循的模式。俄國和義大利兩個國家工業革命發生均較晚且道路曲折，兩個國家均擁有大量的農業人口。十月革命似乎證明了通過某種途徑越過資產階級革命直接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而這個途徑是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所無法設想的。葛蘭西於1918年1月寫道：這是一場同馬克思「資本論」對立的革命：

"事實戰勝了觀念...如果說布爾什維克否認了「資本論」的一些論斷，那麼，他們並未否認（馬克思的）內在的、活生生的觀點...這些觀點，只是馬克思的活生生的思想，它們不會消亡，它們是意大利和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繼續，這些哲學，在馬克思看來，已被實證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污垢所污染。這種哲學認為，歷史的主要因素並不是粗糙的經濟因素而是人，社會的人，相互作用的人...並且通過這種關係產生出...集體的社會意志，他們通曉並評價經濟事實，或使這些事實適應其意志的需要直到他們的意志成為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這些力量創造了客觀實

在。這些推動力像一座可以隨意輸出的，噴發著的火山物質一樣生活、運動、變化。"(11)

這段話反映了葛蘭西得到來自俄國的消息時的激動心情。以及根據克羅齊的術語所做出的本能反應，這段話也許還表明了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還十分膚淺。結果，這段文章經常作為葛蘭西的"唯心主義"、"唯意志主義"，以及他屈從於克羅齊和柏格森（Bergson）思想的證據來反對他。誠然，其後不幾年，葛蘭西主要在列寧的影響下成為更嚴格的馬克思主義者，但葛蘭西在對列寧的成就進行評價時，在他了解到布爾什維克將他們的意志強加於俄國社會和俄國經濟時，他的文章既表明了他理解俄國所發生的一切，也表明了他的不滿，這些不滿在後來他對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一書的批評中表現了出來，因為該書對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概念作了極為粗糙的解釋；也表現了他一直所堅持的思想：經濟上的解釋對說明歷史現象來說是完全不夠的。

11 「反對〈資本論〉的革命」，見1918年1月5日「前進！」，「描繪童年」第149-153頁。

第三章 工廠委員會運動

戰爭結束後，伴隨而來的經濟、社會、政治的破壞在義大利產生曠日持久的危機，這種危機導致1922年底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權的抬頭。在這些年代裡，尤其在1919-1920年"紅色的兩年"中，對許多參加者和觀察者來說，這似乎是使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極好機會。工會成員自1918年到1920年從二十五萬增加到二百萬，在1919年11月的議會選舉中，社會黨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義大利所有工業地區都發生了工人和雇主之間的艱苦鬥爭，同時，農民和無土地的勞動者也開始在政治上組織起來，並要求進行土地改革。罷工浪潮動搖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基礎，使工業家和中產階級警覺起來，並迫使他們同1921年至1922年間不斷強化的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運動攜起手來。此時，自由議會制度看來越來越無法應付這場危機，這次破壞似乎給革命提供了一個機會。

就在這種緊張而令人興奮的氣氛中，葛蘭西從一個鮮為人知的年輕記者脫穎而出，成為在國內外享有聲譽的義大利共產黨一位締造者和領袖。1917年仲夏，都靈反對戰爭和強烈抗議食品短缺的遊行已使許多地方領導人被捕或充軍，這使不適於服兵役的葛蘭西負擔起非常重要的職責。繼而，十八個月以後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葛蘭西 24

，戰爭結束了，葛蘭西及其朋友開始出版「新秩序」，它直到1921年1月前一直是「社會主義文化週刊」，這時，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它已成為「共產主義者日報」⁽¹⁾——義大利社會主義運動氣候變化的標誌。「新秩序」不久就成為富有影響、銷售量很大的報紙，該報討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普遍問題，翻譯外國作家的著作，尤其是無情地批判社會黨領導策略。由於葛蘭西愈來愈深地捲入實際政治決策和革命實踐活動中，因而我們有可能從這些報紙中一週接一週地跟蹤葛蘭西思想的變化、發展。就在這一時期，葛蘭西提出並試圖把他兩個最具特徵的觀點引入實踐過程，儘管這兩個觀點都是葛蘭西思想中的重要因素，但在某種意義上，它們仍然相互矛盾。他的第一個觀點是把革命運動建立在工廠委員會的基礎上，第二個觀點是關於革命政黨的觀點。

都靈是義大利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戰爭期間汽車工業工人數量的增長不計其數。那裡有強大的工會組織和自戰前建立的工廠委員會，它在不太緊張的時期曾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建立過相互溝通的渠道。儘管對俄國革命中蘇維埃的作用，以及對1918年至1919年德國革命中工人和士兵委員會所扮演的部分角色經常發生誤解，但由於這一榜樣，很自然在1919年和1920年都靈工業衝突中工廠委員會似乎是工人運動所能採納的顯而易見的組織形式。正如葛蘭西1919年6月所說：「社會主義國家已潛在地存在於被剝削的勞動者階級特定的社會生活

1 見「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導論」，「新秩序」1921-1922年。

制度中。」⁽²⁾

至1919年秋，工廠委員會運動已遍及都靈及彼得蒙特的許多工廠中。對於葛蘭西來說，工廠委員會不僅是革命運動的核心，它們也將是未來社會的雛型：「工廠委員會是無產階級國家的雛型，無產階級國家組織所固有的一切問題都存在於工廠委員會組織中。」⁽³⁾工廠委員會將成為工人階級的教育中心，也是葛蘭西、陶里亞蒂和塔斯卡在此執教的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並在同委員會運動的聯繫中建立起這些中心。葛蘭西希望，委員會將創造一種組織普通工人的新方法，這種方法將保持工人的自發性，使他們有能力參與決策，並避免在目前工會運動中所出現的官僚主義、以及他認為社會黨領導所存在的怯懦性。他寫道：

「黨必須擁有一個簡明清晰的設想，它必須從小資產階級的議會黨轉變為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一個正在通過建立工人國家的方法為共產主義社會到來的而鬥爭的黨。這個黨必須成為擁有自己信條、策略……和鐵的紀律的純潔的黨……這種永遠同各部門保持聯繫的領導力量必須在所有方面成為無產階級發展的推動力。各個部門必須在所有的工廠、工會、合作者、兵營中提倡共產主義組織形

2 「工人民主」，1919年6月21日「新秩序」第10頁，「論工廠委員會運動」尤見古恩·A·威廉「無產階級的制度：安東尼奧·葛蘭西，工廠委員會和義大利1911-1921年共產主義的起源」（倫敦，1975年版）。

3 「工團主義運動和建議」，見1919年10月「新秩序」第36頁。

式，這些組織不斷地將黨的觀點、政策傳播到群眾中去。這些部門將組建工廠委員會，以管理工農業生產，它將提出必要的口號，以建立工會、工人協會和工人代表大會，它們成為可以信賴的因素，群眾將授權他們以組織政治上的蘇維埃，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4)

誠然，這是一個雄心勃勃而且也許是一個矛盾的計劃，但它卻是一個嘗試。葛蘭西準備在其後幾年中對此綱領加以發展和修改，以便解決所有革命運動都遇到的如何協調自由和權力、自發性和紀律性關係的老問題。

"這種工人民主制...將為群眾制定規範和鐵的紀律，它將成為獲得政治及行政管理經驗的重要課堂，它將吸收所有的群眾，使他們養成堅韌不拔的習慣，並習慣於將自己看作戰場上的一支軍隊，而如果這支軍隊不希望遭到破壞並降低到受奴役的地位，它就需要凝聚力。"(5)

葛蘭西經常運用這類軍事化的比喻。在他看來，革命運動必須成為紀律嚴明、克己奉公和富於獻身精神的力量。工人的民主意味著使工人接受其領導人即"政治委員"所做出的決策，而這些領導人則由委員會成員選舉產生，由選舉者授權給他們，但一經發現他們是少數派時，就必須辭職。(6)包含在整個體系

4 「論義大利社會黨的復興」，見「新秩序」1920年5月8日，第121-122頁。

5 「工人民主」，見1919年6月21日「新秩序」第12頁。

6 關於組織問題的詳細情況登載於1919年10月8日「新秩序」。

中的是這樣一個信念——此後，葛蘭西將把它作為其政治哲學的核心——這個信念就是，通過教育和解釋，有可能說服人民自願地接受其領導人所規定的決策和觀點。

葛蘭西關於工廠委員會的觀點立足於工廠的工人都成為委員會成員這一假說基礎之上。這就是說，工廠委員會運動既應該包括工會成員，也應包括無組織的勞動者，它的支持者既有社會黨黨員，也有持其它政治信仰的人。葛蘭西在1919年8月寫道："在當今工業資本主義歷史條件下階級鬥爭，

"由新型的無階級組織來發動，這種組織基於大工廠而不是小手工業，基於生產單位而不是行業幫會。這種新的組織形式當它借助嚴密的組織功能而發展、成長，繁榮自身時，它便構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框架，成為工業生產領域中無產階級的專政工具(7)。

這個以全新的制度來代替現存的行會結構的提議遭到商業工會領導人，尤其是鋼鐵工人工會的非難，這種非難尤以都靈汽車工業為甚，儘管1919年夏季以後，葛蘭西同已經建立的工會領導人達成了和解，但他們的關係依然不佳。更為嚴重的是，儘管他仍舊有希望贏得大眾的支持，但是，由於他不斷地批評社會黨的領導人，並毫不掩飾他對這些人的輕蔑，因而他同工會領導兩翼的關係越來越糟。

由於都靈工業關係史上的原因，和該城各工廠所存在"內

7 見1919年8月23日「新秩序」未署名文章。

部委員會"以及「新秩序」組織成員已經確立的影響，因而，1919年夏秋兩季在普遍存在的工業騷亂和大眾的不滿中，工廠委員會運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勝利並使人們產生這樣一種印象，就像一句流行的話所說的那樣，都靈真正成了"義大利革命的彼得格勒"。這是不足為奇的。但是，在義大利其他地區，類似的情形並未出現。葛蘭西及其朋友的影響依然局限於某一地區，而都靈的工業民主實驗事實上加劇了義大利工人運動的分裂和解體，在現存的革命派和改良派分裂的基礎上又出現了革命者內部的分裂。儘管義大利社會黨表示了他們對列寧的欽佩，但該黨並不是像列寧所設想並在俄國創建的那種有力地團結起來的革命政黨。

在認識到上述情況的人中，有一個人是來自那不勒斯的工程師阿瑪多·布爾迪加（Amadeo Bordiga），他號召成立更小的、更為緊密團結的和毫不妥協的革命黨，他在戰前就一直擁護發動真正的革命運動，這種運動不應在理論研究中浪費時間。在1912年青年社會主義者代表會議上，他曾經斥責了知識分子的影響，斥責了強調教育和學習的觀點，這些觀點正是葛蘭西思想十分典型的特徵。布爾迪加在這次會議上宣稱："學習的必要性是學校教師會議而不是社會主義者所宣揚的事情。"⁽⁸⁾到1919年，布爾迪加號召社會黨禁止議會活動，清除改良派，把注意力集中到革命組織上來。此後五、六年間，布爾迪加和葛蘭西成為對立的兩極，義大利社會黨激進派和1921年1月同社會黨分裂後產生出來的義大利共產黨在這兩極中搖擺不定。

⁸ 巴奧羅·斯普里阿諾：「義大利共產黨史：從布爾迪加到葛蘭西」，第12頁，（都靈，1967年版）。

1919年秋，「新秩序」的銷量已逾5000份，都靈工廠委員會運動的勝利掩蓋了這一概念的模糊性。我們已經看到，葛蘭西對領導和紀律的必要性的認識同他所堅持的工人階級每一成員都應參加革命決策的需要並不總是相互一致的。在葛蘭西的文章中，許多談到工廠委員會的地方都說明他把工廠委員會看作一種可以長期運用的革命工具，一種教育群眾、團結工人、增加凝聚力和信念以使他們有能力掌握政權的方法。但另一方面，義大利所發生的事件又似乎正把革命形勢推向前去，在此形勢下，有必要採取一些緊急行動，這時已沒有時間認真地組建新型的革命組織。1919年6月爆發了令人難以忘懷的大罷工，這場罷工的目的是聲援匈牙利被挫敗的革命以及被殘酷壓迫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社會黨1919年10月在波倫並召開了代表大會，儘管一直不知道蘇維埃所應包含的內容，但也提出一項號召成立蘇維埃的議案。當時，對一些人來說，蘇維埃是取代自由議會制的一種社會組織，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它則是直接進行革命的方法。此外，這次會議還聲明它緊密地團結在共產國際的周圍。下面所說的就是葛蘭西當時的設想："只有承認工廠委員會是革命過程的開端，則它的建立才有價值，只有實施（對工廠的）控制是革命進程的一個步驟，則實施控制才有意義。"⁽⁹⁾

問題在於，對於革命過程來說，事態發展太快，以至於沒有時間去推進這些事態的發展。正如葛蘭西一向所指出的那樣，社會黨領導人對於社會主義者沒有控制住事態的發展負有一

⁹ 「階級的統治」，見「新秩序」1920年1月3日，第249頁。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葛蘭西 30

定責任。社會主義的領袖們雖然運用了革命的詞藻，但卻沒有真正準備革命，也似乎並不真正相信革命的可能。同時，有力地結成聯盟的工業家們正準備破壞工人運動，並為此而竭力爭取政府的支持。1920年5月葛蘭西描述當時的局勢如下：

"當今義大利，階級鬥爭已進入到這樣一個階段，或是導致革命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創造新的分配方式，以此來復興生產；或是導致對統治階級的非常可怕的反應。統治者為了使工業及農業無產者處於被奴役的狀態，已達到竭盡全力的程度，他們將試圖殘酷地瓦解工人階級政治鬥爭組織（社會黨），並試圖將經濟抵抗組織（工會及其合作者）併入資產階級國家機器。"(10)

這是對未來五年多法西斯主義分子將成功地做到的一切所做的理智而正確的預言。

1920年的春天，當葛蘭西發表這些評論時，衝突已危在旦夕。都靈的工業家拒絕承認工廠委員會或與它們打交道。工人對此進行的回答是持續進行罷工，而雇主們則以關閉工廠來進行報復，政府也派遣大量軍隊以維持該城的秩序。與此同時，米蘭社會黨領導人正進行一場關於蘇維埃作用的抽象討論。葛蘭西抱怨道："當都靈的工人群眾勇敢地捍衛工廠委員會時，在米蘭，他們卻在喋喋不休地空談什麼計劃和建立工廠委員會

10 「為了義大利社會黨的復興」，見1920年5月8日「新秩序」，第117頁。

，以此作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組織形式的理論方法。"(11)

1920年4月都靈罷工失敗後接著是再度出現於義大利各地的工業騷亂，在許多工業城市，這種騷亂採取了占領工廠的形式；在南方的一些地區，沒有土地的農民占領了居外地主地產。三週內，革命危機已經傳播到廣大地區，並且當義大利里拉對外匯兌發生災難性下跌時，再度出現了對整個經濟崩潰的恐慌。此時，出現了妥協，工業家和工會之間達成了一項協議，該協議在大多數工會成員的一次特別表決中通過並簽署。對這一協議，政府承擔了大部分責任，該協議是義大利自由體制的最後勝利。它使工會在工業系統中得到了更多的承認，它在經濟上對工會成員做出了讓步。事實上，它是一個成功的嘗試，它成功地將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統一納入國家機構之內。實際上，這正是葛蘭西所擔心的。1920年9月20日占領工廠開始時，葛蘭西寫道："然而，工人對工廠的純粹而簡單的占領，即使表明了資本主義的軟弱程度和無產階級的大強程度，也不能賦予自身以任何新的明確的地位。權力依舊掌握在資本家手中。"(12)根據葛蘭西的觀點，事實上1920年是以災難和失望而告終的。都靈的工業家已經破壞了工廠委員會運動。葛蘭西似乎已經從社會主義運動殘餘力量的多數人中徹底分離出來了。根據葛蘭西的一般理論，對工廠的占領本應成為革命浪潮的最高峰，而實際上則以改良主義工會領導力量的加強而告結束。葛蘭

11 巴奧羅·斯普里阿諾：「義大利共產黨史：從布爾迪加到葛蘭西」，第53頁，也可見湯瑪索·德蒂：「塞拉蒂和義大利共產黨的形成」，第35頁。

12 「前進報」1920年9月2日。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葛蘭西 32

西及其朋友已失去了對都靈以外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工廠委員會的力量本應為革命過程的下一步驟鋪平道路，但它卻在工廠委員會未發展到下一步驟之前便被破壞了。把委員會看作革命學校和把它作為直接進行革命行動的方法這二者之間的模稜兩可的態度似乎得到了證明。

即便葛蘭西的直接影響也受到限制，但1919年和1920年期間，葛蘭西的名聲超出了都靈這個相對狹小的範圍。在都靈，他度過了戰爭年代。葛蘭西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了興趣，因為列寧在1920年第三國際代表大會上針對反對葛蘭西的左、右翼批評家表示了不快，對葛蘭西集團成員所組成的代表團，列寧指出了「新秩序」、尤其表揚了它所刊登的「為了社會黨的復興」一文。葛蘭西對工廠委員會的擁護已使他開始思考革命組織的一些基本問題，以及工人運動中工業派和政治派的關係問題，但這也使他同黨和工會的領導人疏遠了。他和他的朋友在都靈是孤立的少數派，不久，他們自己也四分五裂，他們的分裂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又一次更大的分裂，這次分裂使義大利社會黨解體並癱瘓。幾個月後，葛蘭西在複雜的戰略環境中作為民族政治人物東山再起，這次東山再起以社會黨1921年1月里窩那（Livorno）代表大會上的分裂，並產生出獨立的共產黨而宣告結束。這些經歷使葛蘭西變成一個更為強硬、更為無情的政治家，也使他能更為熟練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但這些經歷也使他作為一個思想家得到普遍發展，因為這些經歷強迫他去分析1920年的失誤。它們也強迫他更深刻地思考工人和其它集團尤其是農民的關係。此外，幾年後，他提出了關

於革命政黨的思想，這一思想成為他思考的核心問題。

第四章 共產黨

1921年1月，在經歷了數月之久的關於原則及策略的痛苦爭論後，義大利社會黨最終分裂了。少數派的大部分代表退出了里窩那會議並組建義大利共產黨。儘管葛蘭西仍然希望共產主義者可以團結大多數，並希望避免分裂，但他作為里窩那會議的代表在討論中並沒有發揮多大的作用（他根本就不是一個有感染力的公眾演講家，他總是通過其文章在一些小組中，而不是在大庭廣眾面前施加影響）。阿瑪多·布爾迪加在分裂中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在過去的兩年，他一直為此而奔走。正是由於布爾迪加強硬地堅持原則的純潔性、紀律性、並獨立於其它集團，因而在黨的初級階段統治了共產黨。葛蘭西被選為中央委員但不是執行委員，他的主要工作仍是做記者。「新秩序」已成為日報和黨報，葛蘭西繼續充任編輯。

1921年到1922年間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個人生活中對葛蘭西來說都是困難的年代。法西斯黨正在迅速增強其力量，在義大利北部許多地區法西斯幾乎發動了一場內戰，以反對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葛蘭西已習慣於在警衛人員的陪同下往返於公寓和編輯室之間）；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看來就要土崩瓦解，但取代它的似乎不再是社會主義。儘管葛蘭西從未放棄革命

的希望，但現在他認識到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工人運動應更多地致力於保存自己而不是推翻政府。

從個人角度來說，這也是一段艱難的時期。葛蘭西的一個姐姐去世了，他的一個兄弟成了法西斯分子。他的健康狀況再度惡化，為工廠委員會所進行的緊張鬥爭和繼之而來的失敗使他的身體和精神都疲憊不堪。他仍舊繼續工作和寫作，儘管在私下裡他不斷加緊批評布爾迪加的宗派主義和頑固地拒絕同工人運動的其它成員合作以結成反法西斯陣線，但在公開場合，他卻接受了黨的路線。1922年黨決定以第三國際代表的身份將他派往莫斯科。有人曾認為，這是布爾迪加為消除令人窘迫的批評以及排除潛在的競爭對手所做出的調動，但是布爾迪加儘管政治上毫不妥協，可是在個人關係中卻從未出現齟齬。事實上，儘管葛蘭西和布爾迪加在策略和原則上存在著痛苦分歧，但二人之間仍然相互尊重。一位早期黨員曾經回顧道："布爾迪加關心並表示對葛蘭西的健康的痛切憂慮，也深深地敬佩其智慧和知識。葛蘭西欽佩布爾迪加精力充沛的性格和他從事艱苦工作的能力和才幹。他稱讚布爾迪加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為黨最初的組織和建設所做的積極工作。"⁽¹⁾1926年至1927年的一個短暫時期，在他們雙雙被法西斯逮捕後，一齊被拘留於烏斯蒂卡島，此時，彼此間似乎保持著深厚的友誼。正如義大利共產黨歷史學家巴奧羅·斯普里阿諾 (Paolo Spriano) 所指出的那樣，第三國際領導為了改換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並使

1 卡米拉·瑞弗拉，引自巴奧羅·斯普里阿諾：「義大利共產黨史：從布爾迪加到葛蘭西」第249頁腳註1。

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他們就得罷免布爾迪加，這種說法並不過份。事實上，三年後，他們也的確這樣做了。

1922年危機期的幾個月葛蘭西是在莫斯科度過的，這段危機在十月份以墨索里尼就任義大利總理從而開始法西斯時代而告結束。在莫斯科的大部分時間，葛蘭西住在一所療養院以恢復其完全崩潰的身體及神經。在那裡，他遇到舒赫特 (Schucht) 一家，這個家庭包括母親及三個女兒，其中的一個女兒朱莉雅 (Giulia) 後來成了葛蘭西的妻子和他兩個兒子的母親。1923年12月份，葛蘭西被第三國際派往維也納，翌年5月返回義大利。由於葛蘭西被選為義大利議會代表，所以他可以無視法西斯對共產主義者的迫害。儘管法西斯分子已成功地控制了國家，迫害他們的敵人，但是，墨索里尼並沒有馬上取消議會，有一段時期，甚至反對黨的議會代表還享有不可靠的免於拘捕的豁免權。歸國後，葛蘭西發現他實際上已經成了共產黨的領袖，因為，正如我們將要了解的一樣，布爾迪加已不打算執行國際所制定的政策了。

自1921年至1926年底葛蘭西被捕，他不僅深深地埋頭於制定義大利共產黨的政策，也深深涉及共產國際的政策。他比一生中其它任何時期都更多地思考著有關共產黨和它的內部爭論、以及法西斯長期而直接的威脅等緊迫問題。同時，由於共產黨的存在，以及它同社會黨的分裂的一個基本原因就是它接受共產黨國際領導機構的領導，所以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即在1919年和1920年期間被寄予許多希望的歐洲革命在不遠的將來不會發生時，葛蘭西自己的觀點也必須順應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葛蘭西 38

或至少也要適應和解釋黨的路線。尤其是在這時，在列寧病危期間和1924年逝世後，俄國黨內的權力之爭已經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起反響。

在這一時期，葛蘭西關於理想的革命黨和改造生產力的思想很難有機會付諸實踐。在這一時期，面對法西斯的威脅，某些黨組織的維護和保存必然成為一項生死攸關的任務。工廠委員會運動失敗後，葛蘭西認識到也許由於缺少一個全民族的黨組織才導致都靈的失敗，因而，他開始提出建立一個紀律嚴明、組織嚴密的革命黨的觀點。在1920年後期和1921年寫的許多文章中，他一直不斷地批評義大利社會黨。不管新的政黨將成為什麼樣子，總之它將不會像社會黨那樣。葛蘭西尤其批評了義大利社會主義的偉大的悲劇人物加辛托·麥農蒂·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他試圖執行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即一方面保持黨的統一，同時又依附第三國際，而第三國際則堅持要求消除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塞拉蒂要求由社會黨來行使無產階級專政，而同時又認識到義大利局勢的困難性和複雜性。

"革命不是某位'領袖'所施的魔法....革命是千變萬化、各種各樣環境和複雜因素的總計，這一切交織在一起，並在給定的歷史時刻導致危機的解決，而這些危機則有著堅實而深刻的經濟根源。"(2)

2 G.M.塞拉蒂：「依靠列寧同志周圍的共產黨人的團結」，引自卡麥特：「安東尼奧·葛蘭西和義大利共產黨的起源」第135頁（斯坦佛，1967年版）。

從根本上說，根據他更為深刻的反思，葛蘭西也許不會不同意。但是，在1920年至1921年的環境中，他相信正由於事情如此複雜，正是由於保持黨的團結的緣故，拒絕採取行動只能導致災難。在塞拉蒂運用同樣字眼之前幾個月，葛蘭西也曾寫道："革命不是變魔術。"但是，他繼續寫道，"革命是歷史發展的一個辯證過程。"並且還號召工廠委員會創造這樣一種形勢，在這種形勢中，工人"不再通過議會喧鬧的、混亂的表演而是在工人公社裡表達他們的社會意志，他們所面對的是今天還在奴役他們而明天將成為他們的統治對象的機器。"(3)

現在對葛蘭西來說，塞拉蒂和義大利社會黨代表著他在義大利生活中最厭惡的一切。在他的一篇最辛辣的文章中，他將這些社會主義者比作義大利古典喜劇人物普西尼拉（Pulcinella）。

"普西尼拉是義大利人的經典類型，是個什麼事也做不了，什麼事也不在乎的人，而社會黨的許多態度就是這種類型的絕妙化身。普西尼拉對一切事情都不認真，普西尼拉總是逃避為他的行為承擔全部責任...他們（指社會黨）教導說，階級鬥爭就像一場遊戲，在這場遊戲中，他們命裡註定總是正確，因為歷史就保證他們永遠正確。這場遊戲又像一尊超然的天神，很少受凡人行為的影響，以便使之像神秘的命運，或更像一個鐘擺那樣走馬燈似地

3 「革命的發展」，見1919年9月13日「新秩序」，關於該文的詳細討論見古恩·A.威廉「產階級制度」，從第144頁開始。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葛蘭西 40

沿著一個方向轉呀轉...但是，有一天，這場遊戲散場了，走馬燈滅了。”(4)

葛蘭西的這些抨擊經常包含對一些社會黨領導人的人身攻擊。後來，葛蘭西認為有必要在1922年義大利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演講中，為他的抨擊加以辯護：

“我認為正是從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出發，進行這場極端尖銳的反對社會主義者領導人的鬥爭才是十分必要的。當逆流挫敗了工人階級的時候，至少有必要成功地說服群眾，失敗的責任不在於他們，以便不使他們對自己喪失信心。”(5)

1926年塞拉蒂逝世時（同年，他已加入了共產黨），葛蘭西甚至準備為他致哀：

“塞拉蒂同志是老一代義大利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中最崇高和最卓越的代表，他表現了前輩所能表現的最寬厚無私的品質...的確，在我國，沒有任何一個黨的領袖像他那樣受到人們的愛戴。”(6)

4 「普西尼拉」見1921年4月16日「新秩序」第354頁。

5 「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見1922年3月28日「新秩序」，第512頁。

6 「塞拉蒂同志及其同時代的義大利社會主義者」，見「團結」1926年5月14日，該文載於加恩瑟羅·費拉塔和尼科羅·加羅合著「葛蘭西2000頁書及其戰鬥年華」，第770頁。

1920年，偉大的抗議運動失敗後，葛蘭西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指責社會黨領導人，並強調有必要糾正群眾十分容易犯的那些錯誤：

“呵！義大利社會主義對於群眾來說，是早期覺醒和反抗的自發運動，是一場解放運動，這場運動以混亂的形式開始，它沒有十分清晰的自我意識，混亂但卻充滿了熱情和一切發展的可能，尤其充滿了首創精神，並以堅韌不拔的精神去付諸行動。義大利社會主義，它的理論家的頭腦，它的領導者和鼓動者的頭腦十分不幸地同最抽象、最枯燥、最貧乏、名之曰實證主義的十九世紀哲學相聯繫。”(7)

葛蘭西再次強調，一個傑出的政黨其領袖擁有行動意志的必要性。這種強調在某種意義上歸因於他討厭盲目信仰粗糙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黨領袖們的含混態度，同時，他歸因於他討厭（即使這種厭惡是短暫的）群眾本身。1920年9月，在工會接受同雇主的和解以結束占領工廠之前，葛蘭西寫道：

“無產階級運動的領導人把他們自己基於‘群眾’基礎上，他們追求在行動上的預先一致，並在他們自己所選擇的形式和時間裡進行協商。而另一方面，革命卻只能基於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基礎之上，預先的協商和代表會議體制的

7 「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見1921年1月2日「新秩序」，第11頁。

領導，對革命都是不妥的。革命就像一場戰爭：正如一場戰爭由軍隊總參謀部做準備一樣，工人總參謀部也必須時時刻刻準備革命這場戰爭。而代表會議只能確認已經發生的事情，獎賞勝利並毫不寬容地懲罰失敗。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責任就是使群眾永遠保持旺盛的革命鬥志，以創造使群眾準備採取行動、立即響應革命號召的條件。民族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也用同樣的方法，通過瘋狂地鼓吹愛國統一和對外部的仇恨來竭力創造條件以使群眾支持由總參謀部和外交部蓄意謀劃的戰爭。如果一場戰爭一開始就要獲得人民的批准，那麼，任何戰爭都不可能爆發...同理，革命運動也不可能讓工人全國會議來發號施令。無產階級的解放不是無足輕重或小人物的事情，只有思想堅定，意志敏銳有如利劍，在最困苦的失敗面前不愧為工人階級的戰士的人，才能被稱為革命者。"(8)

葛蘭西試圖將工業民主的某些形式同由具有獻身精神的傑出人物所領導的強大的政黨結合起來，這意味著他不僅批判了社會黨的無能和妥協，也把他自己同無政府主義者明顯地區分出來。該集團在當時義大利工人運動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一些人曾是工廠委員會的積極分子。在葛蘭西看來，無政府主義者不僅是宗派主義者，自命不凡地覺得他們的革命是純粹的革命。正如葛蘭西所說："他們勸說人們，他們就是已發現的革命真理的陳列館。"(9)同時，他們也是烏托邦主義者，他們沒

有看到一個成功的革命黨必須立足於特殊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基礎之上，根據葛蘭西的看法，這樣的階級意識是不能自行產生的，而必須經過認真地培養。生活於現存工業社會中的無產階級實際上太混亂、太不幸，以至無法懂得他們自身的真正利益：

"期望在身心兩方面均已墮入被奴役狀態的群眾自發地實現歷史的發展，期望群眾能自發地開始並持續進行革命的創造活動，是唯心主義者的幻想。依靠這類群眾的不可匹敵的創造力而不是通過系統的工作組織一支有紀律的、自覺戰鬥的偉大軍隊，不準備付出任何犧牲，不教育他們把口號同時付諸實踐，不準備為革命承擔實際義務，不準備做革命的動因——這一切，都是對工人階級的真正背叛，是對前進中的革命的不自覺的反動。"(10)

義大利工會中工團主義也同樣糟糕，1919年11月葛蘭西寫道：工團主義者的理論，

"一直是一種特殊的組織形式的理論，即手工業或工業工會的理論。它當然也是建立在現實基礎上的，但卻不是建立在自由競爭和私人占有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制度所形成的現實基礎之上，因而它仍然只能是一個烏托邦，一個偉大而抽象的空中樓閣。"(11)

8 「政治能力」，見1920年9月24日「前進報」，「新秩序」第171頁。

9 「論無政府主義」，見「新秩序」第396頁。

10 「論無政府主義」，見「新秩序」第400-401頁。

11 「工團主義和建設」，見「新秩序」1919年11月8日第48頁。

新的革命黨必須避免無政府主義者含混的樂觀主義，它也必須避免工團主義的幻想，他們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指導下的某種組織形式中也依然可能實現革命的目的。

在共產黨內積極活動的這些年代裡，葛蘭西發現他在理論上遇到一些困境。他相信，一個工人階級的革命黨必須基於某種特殊類型的階級意識基礎之上。在組織和道德價值觀念兩個方面，它都必須從資產階級世界中徹底解放出來。另一方面，由於布爾迪加拒絕同其它社會力量達成任何協議，即使是策略性協議，因而，葛蘭西對布爾迪加越來越失去耐心。同時，一方面他仍然相信政治決策的參與形式，他認為，這種形式在工廠委員會運動中已經取得成功；另一方面，他又越來越強調堅強而果斷的領導的必要性。此外，他和布爾迪加都接受了列寧關於革命黨的獨創性概念，但在1922年後義大利的局勢中，他們對這一概念的意義的認識又存在分歧。由於他們每個人都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因而同第三國際為了在義大利實現其所要求的一切而制定的原則越來越不協調。為了理解葛蘭西和布爾迪加之間關於共產黨的性質的爭論，以及他們二者同共產國際的關係，包括他們對托洛斯基的態度，我們必須了解葛蘭西如何分析法西斯主義的性質，以及同法西斯主義鬥爭的方法。

第五章 法西斯主義

五十多年以後，在此期間歷史學家和政治科學家已有能力分析法西斯主義，了解它的國際背景，並研究法西斯主義制度在德國和其它國家也包括在義大利的上升和沒落，我們也已經有了比1921年或1922年的任何觀察家可能形成的關於法西斯主義性質的更為清晰的看法。只有葛蘭西逐漸認識到，法西斯主義不僅是一種曇花一現的現象，同時也認識到，法西斯主義所支持的社會制度如果要同可觀察的事實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相一致，就需要對之進行一種精緻的分析。

1919年初，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已初露端倪，當時，墨索里尼已奠定了法西斯主義運動，把它建立在某些社會集團基礎之上，這些人在1914年和1915年期間支持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義大利參戰而領導的那場戰役，他主要從退役軍人中汲取力量，這些人對市民生活大失所望，經濟上不滿，由於在和談會議上義大利失去了他們認為應得的領土，因而傷害了他們的民族感情。他們企圖把極端的民族主義同對新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模糊要求結合起來，並自視為法律和秩序的維護者，使它們免除革命的破壞。1919年4月他們燒毀了米蘭社會主義者報紙「前進」辦事處，這就是他們所使用的方法。可是，在1919年

秋季選舉中，很顯然，他們沒有成功。在以後的兩年期間，墨索里尼系統而有效地擴大了他的支持基礎。另一方面，他致力於爭取更多的尊重，並贏得工業家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支持。與此同時，他又把法西斯組織建設成一支有力的隊伍，這支隊伍即使不是經常得到警方和其它政府機構的積極支持，也是得到了他們的默許，他們在義大利北部許多地區成功地威脅著他們的敵人，煽動人們對革命的恐怖，在那些社會主義者在地方政府中已有強大勢力的省份，這種情況更甚。因此，他們使社會主義者進行正常的集會和政治活動越來越困難。到1922年葛蘭西赴莫斯科時，似乎出現了內戰的局勢。

葛蘭西知道義大利人之間的相互爭鬥是多麼的殘忍：

"義大利的階級鬥爭總是具有某些人在'人類'經歷未成年時所具有的那種粗劣的特性。殘忍和缺乏同情是義大利人兩個凸出的特點，他們從兒童式的多愁善感發展到最粗魯野蠻的噬血行徑，從狂暴的憤怒發展到冷酷地計算殘害對方。"(1)

在葛蘭西看來，法律和秩序的崩潰是自由資產階級國家破產的信號，也是它本身行將崩潰的信號。"國家的解體，法律的終結，社會的分解，1921年5月，「新秩序」上的一篇未署名文章（很可能出自葛蘭西之手）寫道，"根據這些情況，我們可

1 「武力因素」，見「新秩序」1921年4月26日；「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第151頁。

以對今天政治形勢做出估計，這些情況如果不標誌資產階級作為一個可以發號施令、創造和維持國家生存的滅亡還標誌著什麼呢？"(2)在這種環境中，社會每一階層都尋求竭力保障自己生存條件的方法。無產階級，

"不能在資產階級的法律中，即在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武裝力量、法庭、行政機關）中尋求保護人和保障其生命、自由、個人完整以及麵包等基本生活權利的因素。無產階級有權建立自己的法律，創造自己的抵抗和防禦機構。"(3)

但是，現存國家的垮台，作為自由社會之基礎的民意的扼殺對資產階級來說，也產生了一些後果，法西斯主義就是這些後果之一。"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暴力的非法後果，國家的復興則是這種暴力的合法後果。"(4)葛蘭西認為，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可以用來保持其權力和保障其經濟制度的現存的唯一方法，而這一制度已經被戰爭搞得十分緊張。"法西斯主義是以機槍和手槍來解決生產及交換問題的一種嘗試。"(5)

2 見「新秩序」1921年5月11日。

3 「真正的辯證法」，見「新秩序」，1921年3月3日；「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第860頁。

4 「對這件事的反應」，見「前進報」1920年11月24日；「新秩序」第366頁。

5 「義大利和西班牙」，見「新秩序」1921年3月11日；「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第101頁。

總之，儘管法西斯主義符合舊的統治階級的意願，但舊的統治階級也不是他們的唯一基礎。1924年8月，葛蘭西在寫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法西斯主義的典型特徵在於它組建成了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群眾組織，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⁶⁾這一點在1921年5月法西斯主義勢力開始增長時，他就已經注意到了：

"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是什麼？它是義大利資產階級最低層，即窮兵黷武、無知者和冒險家階層的暴亂。對於他們來說，戰爭給予他們以這樣的幻覺，即戰爭是有利可圖的、也是十分必要的。這些人一直被政治和道德腐敗的國家推動著。"⁽⁷⁾

葛蘭西常說，小資產階級就像科普林「叢林札記」中胡說八道的猴子部落一樣，沒有基礎，具有破壞性。對組成舊的統治階級的工業家和地主的反革命意願來說，小資產階級是反對革命的天然工具。由於這個緣故，葛蘭西相信，把法西斯主義掌握政權說成是一場革命這是錯誤的，因為新的制度沒有階級基礎。葛蘭西也相信，這不是一場真正的革命，法西斯主義基本上同資產階級統治的其它形式沒有區別。為了保持他們的社

6 「義大利的危機」（1924年8月13-14日給義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載於「共產黨的建設」（都靈，1971年版），第33頁。

7 「法西斯主義政治」，見「新秩序」1921年5月25日；「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第167-168頁。

會及經濟地位，資產階級準備摧毀他們自己建立起來的自由國家。"歷史已發展到這樣的時刻，它迫使資產階級放棄它所創造的東西，這樣的時刻在義大利已經到來。"⁽⁸⁾如果法西斯掌握政權是死抱權力不放的資產階級已處於絕望境地的徵兆，那麼他們的統治仍然注定要讓位給無產階級革命。法西斯主義再壞也不過是轉瞬即逝的現象。正如葛蘭西後來所說："很明確，這場危機就在於這樣的事實，舊的東西正在消亡，新的東西尚未誕生。在這個新舊政權交替時期，出現了最複雜的現象。"（「獄中札記」第311頁）⁽⁹⁾正如1924年他對黨的中央委員會所說的那樣："法西斯制度並未能阻止資本主義制度的總危機的到來...法西斯主義只不過延緩了無產階級革命，這場革命在法西斯主義失敗後將會受到真正的歡迎。"⁽¹⁰⁾

這最後一句話是理解這些年來葛蘭西所思考的許多問題的鑰匙，這些思想旨在發現使革命普及並贏得群眾對革命黨的支持的新方法。當他赴莫斯科時，義大利形勢正在惡化。1923年初，幾乎所有義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包括布爾迪加都被逮捕，儘管同年年末大多數人被釋放，它仍表明當時反對黨的行動是多麼困難。此後，黨被迫一步步轉入地下活動。因此

8 「合法性」，見1920年8月28日「新秩序」，「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第306頁。

9 見湯姆斯.A.貝奇：「葛蘭西和文化霸權理論」，「觀念史雜誌」，第36卷，1975年4-6月。

10 「義大利危機」，見「新秩序」1924年9月1日，「共產黨的建設」第30-31頁。

葛蘭西在莫斯科然後在維也納從病中恢復過來時，他比留在義大利的一些同事更樂觀些。（他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為他克服了極為嚴重的疾病，及他在俄國所見所聞，他同國際領導人建立的直接聯繫振奮著他。1923年，他在維也納寫道："每天...人們創造新的生活、新的道德、新的關係、新的思維方法並提出新的問題...這一景象使得我對我的祖國及其未來更為樂觀。"(11) 這個信念在他個人感到孤獨並易於倦怠時受到了損害。"我收到義大利同志的許多信，"他在給朱莉雅的信中說，

"他們希望在我這兒得到信仰、熱情、意志力、力量。他們相信我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他們相信我一定擁有這份豐厚的禮物，因而我一定能夠對他們慷慨解囊。"(12)

當他返回義大利時，從許多方面看來，黨的形勢都極為嚴峻。在1924年4月的選舉中，葛蘭西回到了議會，而這次選舉使左派遭到嚴重的阻礙並使法西斯主義分子成了議會中最大的政黨。然而，葛蘭西仍舊堅持他的信仰，"就像沙皇在俄國的行

11 「給芝諾·芝尼的信」，見巴奧羅·斯普里阿諾的「義大利共產黨史：從布爾迪加到葛蘭西」第343頁。

12 「給朱莉雅的信」，1924年3月6日，見「葛蘭西的2000頁書」第2卷，第23-24頁。

徑一樣，法西斯主義事實上創造了持久的革命局面。"(13)但他為這樣的事實擔憂，這就是，共產黨仍舊作為弱小、孤立、沒有群眾基礎的小集團，怎樣才能抵抗不斷升級的法西斯主義的侵犯。

他從布爾迪加關於黨的思想開始去分析黨的這一弱點。由於布爾迪加拒絕承認那些曾支持過舊的自由制度的政黨同法西斯主義者有什麼區別，因而他把共產主義者同其它反法西斯主義的集團完全隔絕開來。在把改良主義者看作"資產階級的左翼"的觀點上，布爾迪加和葛蘭西是一致的，但葛蘭西逐漸認識到，在主要任務是抵抗法西斯主義的時期，為了贏得群眾的支持，共產黨人就必須努力去擴大自己的感召力——向農民尋求支持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有可能，甚至應向自由資產階級的一些階層尋求支持。

為了實現這一點，黨就需要改變自己的性質，葛蘭西在維也納時寫道：布爾迪加，

"不承認黨是一個辯證過程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革命群眾的自發運動通過中央的組織和指導凝聚起來，但這種凝聚只能是自身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當革命形勢順利發展，革命浪潮達到它的頂點，或者說，當黨中央的定應該發動攻勢並走到群眾中去激勵和推動他們採取行動時，群眾將能夠趕上局勢的發展。"(14)

「給芝諾·芝尼的信」，見巴奧羅·斯普里阿諾的「義大利共產黨史，從布爾迪加到葛蘭西」，第343頁。

巴奧羅·斯普里阿諾：「義大利共產黨史，從布爾迪加到葛蘭西」，第305頁。



根據葛蘭西的觀點，黨必須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革命前的中間階段，黨必須準備服從工人階級的態度，而不能像布爾迪加所認為的那樣，把黨立足於"對未來的歷史階段的期待上，在這一歷史階段上，黨的任務是引導工人階級為奪取政權作最後的衝刺。"⁽¹⁵⁾黨當然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並且也是唯一有能力集中工人階級所採取的所有活動形式——包括工會、黨的出版機關、工廠委員會——的組織。但為了做到這一點，黨就必須同無產階級大眾打成一片，並取得他們的信賴，無論他們是黨員還是非黨員。

這並不等於說革命的念頭應該被取消，或者說黨應該採取老社會主義者所採取的方法，即同現存秩序妥協來尋求群眾的支持。但是，革命要取得成功，革命黨就不應成為孤立的少數派，就必須擁有群眾的力量作為後盾。如果真的做到這一點，形勢就會好起來，因為法西斯主義制度儘管已經延緩了革命，但它仍然正在為革命奠定基礎。葛蘭西在莫斯科的一次講演中說——這段話在墨索里尼倒台二十年後成為義大利共產黨的一個關鍵原則——在法西斯主義統治失敗後，

"我們將進入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進行鬥爭的關鍵時刻。距離這一時期的到來還將有一個或長或短的遙遠時期。很難說，也很難預料義大利局勢將如何發展，但我們可以斷定法西斯主義的解體將標誌著奪取政權的決定性的鬥

15 同上，第483頁。

爭的開始。⁽¹⁶⁾

直到1926年11月葛蘭西被捕時，他才看到這一時期可能接近的信號。他相信，分裂小資產階級同葛蘭西認為構成法西斯主義力量基礎的那些集團的聯盟機會已經出現，因而支持法西斯主義的力量將遭到削弱。但即使這種情況發生了，也不能同竭力維持法西斯時期以前的舊制度的資產階級妥協，儘管葛蘭西知道合法的反對派所支持的自由制度和秩序比橫行霸道、凶殘毒辣的法西斯主義要好。

葛蘭西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懷疑自由主義反對派的軟弱性。1924年夏，墨索里尼面臨一場重大危機，這時，很顯然，群眾在迫在眉睫的形勢中，對野蠻暗殺改良派社會主義者代表馬奧蒂 (Matteotti) 做出了反應，議會中的反對黨以拒絕參加其會議、全體退場或前往阿文丁 (Aventine) 召開另一個會議等方法以示抗議。但他們除了做這些姿態外，別無辦法，他們發現自己無力推翻墨索里尼。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共產黨議會代表團 (該團一開始就參與了阿文丁分裂) 領導人的葛蘭西決定他和十八名共產黨代表返回議會以直接同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這是一個令人注目的景象。聽眾是充滿敵意的法西斯主義者，包括墨索里尼自己在內，他們緊張地聽著從葛蘭西低低的聲音和快速發表的講話中講出的每一個字眼。主要議程是由法西斯政府介紹取締弗里曼森 (Freemasons) 法議案。葛蘭西在冷靜地回顧了自1870年以來的義大利歷史和自由國家的作用後，他重申了他的觀點，由於法西斯主義制度不是以新的階級為

16 巴奧羅·斯普里阿諾：「義大利共產黨史，從布爾迪加到葛蘭西」，第279頁。

基礎，因此，法西斯主義者沒有進行革命，而只是更換了執政的班底。他抨擊了反弗里曼森法在法律上的偽善性："影響你們的並不是弗里曼森法！弗里曼森法將成為法西斯主義的一翼。這項法律是針對工人和農民的，他們將依據該法律所提供的一切來清楚地了解它。"他的發言不斷被墨索里尼和其它法西斯主義領導人打斷，有時他甚至失去了論辯的思路。最終，在回顧上述觀點之後，儘管有點證據不足，但他仍舊勇敢地宣稱："革命運動將征服法西斯主義。"(17)

1920年工廠委員會運動失敗以及對工廠的占領結束後，葛蘭西曾確信，革命黨需要的是更嚴格的紀律和更嚴密的組織。1922年後，由於法西斯主義者鞏固了他們的權力，而共產黨卻顯然沒有吸引群眾的支持，因而他又回到這一思想，即黨應奠定更寬廣的基礎。有兩種贏得群眾支持的方法；第一種是爭取仍然追隨社會主義者的工人階級成員；第二種方法，也是葛蘭西有時認為更重要的方法，這就是爭取農民，葛蘭西自青年時期起在撒丁就特別注意這個階級。

為了尋求拓寬共產黨的基礎，而不是像布爾迪加所擁護的那樣，使黨成為傑出人物的小集團，葛蘭西運用同莫斯科第三國際領導人分析歐洲一般局勢相類似的術語來說明義大利局勢。其結果是，布爾迪加失去了第三國際的支持；葛蘭西返回義大利不久便就任黨的總書記。同時，由於已確認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政策是反法西斯主義的正確方法，因此，一個新的企圖

17 葛蘭西的講演刊登於1925年5月23日「前進報」，再版於「共產黨的建設」，第85頁。

就是，爭取塞拉蒂和追隨他的社會主義者。這一措施部分地取得了成功，事實上，義大利社會黨再次發生分裂，塞拉蒂及部分追隨者加入了共產黨，而大多數社會主義者還未被爭取過來，並產黨人依舊是少數黨。

葛蘭西返回義大利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到一些挫折，尤其在德國，試圖於1923年秋季舉行的共產主義暴動成為徹底的不幸。同時，在莫斯科，托洛斯基和其他黨的領導人之間關係的破裂已開始在整個共產主義運動中產生了反響。當葛蘭西取代布爾迪加成為黨的實際領導人時，布爾迪加仍然作為不肯屈服的批評家批評"來自下面的統一戰線"，以及由葛蘭西所說明的該統一戰線的內容。葛蘭西此時正在為聯合所有工人（不管他們在政治上歸屬於誰），尤其是為聯合農民而工作著。雖然布爾迪加仍然是黨的中央委員，由於在莫斯科的托洛斯基危機的加劇，許多人都發現布爾迪加的傲慢和不可調和的獨立性同托洛斯基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在葛蘭西看來，黨內分裂的危險導致黨員對其領導失去信心。"布爾迪加的態度同托洛斯基一樣，"葛蘭西寫道，"具有災難性的影響；當布爾迪加這樣一個重要的同志堅持向一邊倒時，在工人中就產生了對黨的不信任，使失敗主義抬頭。"(18)

葛蘭西為黨怎樣擺脫同塞拉蒂和社會主義者以往所積下的夙怨而焦慮。新的黨報被審慎地命名為「團結」。在法西斯壓迫的黑暗環境中，他感到黨必須依靠俄國的支持，他希望在國際國內都靈保持團結，因而，他非常擔憂俄國共產黨的分裂。他對托洛斯基批評俄國正在發展的官僚主義抱有一定的同情，

18 巴奧羅·斯普里阿諾：「義大利共產黨史，從布爾迪加到葛蘭西」，第441頁。

但他尤其對俄國領導人自相分裂的行動感到苦惱。"今天，你們正在自我破壞，"1926年被捕前不久在給俄國領導人的信中他寫道，"你們正在降低黨的威望，並十分危險地破壞著在列寧的推動下蘇聯共產黨已取得的指導作用。"(19)他譴責"左派"——托洛斯基和布爾迪加製造了這些分裂，他相信，在這個危急關頭，團結是必不可少的。他再次陷入紀律和自由之永恆的二難推理中，他對調和二者關係並不感到失望。他相信只要不導致公開的分裂，那麼黨內各集團間就有商討和爭論的餘地。"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團結和紀律都不是機械的和被迫的，二者都必須基於忠誠和信心，而不能像被圍困的敵人小分隊那樣，策劃著逃跑並來個出其不意的突圍。"(20)在他給俄國共產黨的信發出的幾個月後，葛蘭西便被捕入獄，因此，他作為政治領導人的活動生涯宣告結束。因而，他不像他的朋友陶立亞蒂，陶立亞蒂赴莫斯科並在史達林時期生存了下來，也不像塔斯卡，塔斯卡在流放巴黎期間出版了葛蘭西給蘇聯領導人的信，在開除出黨後，他成為黨的最辛辣的批評家，而葛蘭西則再也不必面對史達林強加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那種考驗和緊張局面了。

19 「葛蘭西的2000頁書」，第1卷，第832頁。

20 巴奧羅·斯普里阿諾：「義大利共產黨史，秘密的一年」第55頁。

第六章 里昂提綱和南方問題

從葛蘭西歸國到入獄前的兩年半時間裡，法西斯政府的迫害不斷升高。葛蘭西一直致力於共產黨的領導工作，厚實它的基礎，並使它適應秘密活動等實際問題。他擔心蘇聯黨的內部分歧，他擔心與托洛斯基的絕裂會波及義大利及共產國際內的其它黨。儘管他對第三國際黨的路線的解釋使他取代了布爾迪加的領導地位，但他真切地希望要把布爾迪加從中央委員會中開除出去，並真切地希望保持黨的團結。他這一時期的理論著作因而必然地集中於解決困難和日常的組織和策略問題。然而有兩個文件，根據這兩個文件，我們可以清楚1925年至1926年間葛蘭西的立場，但這些文章也涉及葛蘭西在囚禁期間將要致力解的的重大課題。第一份文件就是所謂"里昂提綱"，該文件葛蘭西起草了一大部分，並在1926年1月於法國里昂召開的義大利共產黨代表大會上做了修改，當時，在義大利召開這樣的黨代會是不可能的。第二份文件是葛蘭西被捕時尚未完成的名為「關於南方問題的一些探討」的文章。

里昂提綱和那次會議上關於它的討論，既標誌著葛蘭西戰勝了布爾迪加，也標誌著葛蘭西追隨共產國際的路線。在那次會議上，據說葛蘭西發言四小時，而布爾迪加則發言七小時。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葛蘭西 58

提綱也體現了最近兩年多來葛蘭西據以重新建黨的原則。在里昂代表大會上，葛蘭西一如既往地強調，黨必須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而不能像布爾迪加所堅持的那樣，成為同它所要領導的群眾相脫離的工人階級運動中的一個組織。既然社會民主黨和自由黨越來越表明他們無力組織對法西斯主義的抵抗，因而他承認，來自下層的統一戰線就是必要的，在統一戰線中，由於共產主義者的獻身精神和榜樣作用可以使工人階級其它政黨和組織的群眾加入進來。法西斯主義者的經歷證明，只有工人和農民的革命黨才是唯一可能替代法西斯主義的統治形式。此外，葛蘭西還相信，義大利比在西歐其它先進的工業國家更容易推翻資本主義。為了創造一個既可以在法西斯主義迫害時期，也可以在革命的準備階段生存下去的政黨，他認為第三國際的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是必要的。黨應建立在緊密地組織起來的基層組織基礎之上，而對葛蘭西來說，這些基層組織將是適應變化了的環境的工廠委員會。

里昂會議決定是經驗豐富的政治領導人葛蘭西所取得的極大成就。也是一個很有特點的嘗試，這就是企圖把忠實於第三國際路線同這一路線在義大利特殊條件下的現實結合起來，把群眾的參與同維護黨的紀律協調起來。里昂提綱在關於知識分子在黨內的作用以及黨爭取"領導權"的方法這兩個問題上都是清楚的，黨只有通過高度的組織機構及時對客觀形勢的高度理解，才能獲得對其它集團的"領導權"。

葛蘭西在1926年一篇論南方問題的文章中以更加理論化的方法發展了這些論點。葛蘭西在都靈的早期經歷使他確信：農

村必須期待城市的拯救。他不久就使自己同城市生活相一致。正如他都靈的一個最敏銳的非社會黨朋友所說，"他來自鄉村，卻似乎忘記了自己的傳統，他真摯而頑強地努力向城市居民的現代化發展，以取代撒丁那種不合時宜的病態傳統。"⁽¹⁾但在他看來，城鎮和鄉村的關係是不可分割的。葛蘭西對城市和農村關係的關注解釋了他成熟時期政治著作的許多關鍵思想，這些思想中既包括他所謂文化霸權性質——根據這種方法，少數人可以對多數人實行領導，並將其價值觀念強加給多數人——的論述，也包括關於義大利國家的性質以及關於十九世紀義大利復興運動中建立起來的，在葛蘭西看來，多少有些不穩定的統一之基礎性質的論述。

都靈市工人階級可以通過它的行動影響農民的生活條件。諸如他們曾抵制關稅保護，這種關稅保護對農民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它使農民轉而將不適於生產穀物但卻可更好地用於其它目的的土地種植穀物。

"都靈由於麵包價格上漲的威脅而進行的罷工有助於治愈撒丁和卡萊伯里 (Calabria) 毀林種穀的難災性狂熱，這種說法並不自相矛盾。這種狂熱歸因於錯誤地相信穀物價格的上漲會馬上引起土地利潤的增加，而這些土地上的樹木只需從地表層下的水份中汲取營養，並且，它們在未來的經濟運籌中將會成為真正最有利可圖的財富的源泉。⁽²⁾

1 皮埃羅·高伯蒂，「政治著作」，（都靈，1960年版）第1003頁。

2 「教士文化」，「前進報」1916年7月7日，引自安東尼奧·葛蘭西的「南方問題」。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葛蘭西 60

當俄國革命爆發後，葛蘭西迅速地認識到，儘管馬克思主義理論要求城市工人階級應成為革命的先鋒，但正是農民從根本上造成了革命的高漲，這些群眾給予革命以最大的支持。因而，1923年以後，他愈加關心創造一種新的方法，以使義大利共產黨擁有比布爾迪加所設想的更為寬廣的基礎。很自然，他應該了解如何使工人和農民聯合起來的問題，但是無知、貧窮、孤立的農民依靠自己只能感到無目的的不滿，而控制這種不滿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他們依照自己的革命直覺去行動則只能導致災難。

"貧苦的農民從沒有耕種過、或耕種條件極壞的土地上能得到什麼呢？沒有機器，在其工作的土地上沒有房屋，沒有可以維持到收穫季節的貸款，沒有收割所需要的合作制度...爲了把他從高利貸者的魔爪下解救出來，一個貧窮的農民可以因掌握土地而期望得到什麼呢？起初，它可以滿足他對土地的原始貪欲；其次他會認識到，靠他的手無法耕作，只有使用機器才能耕種土地，然後他又認識到需要種子、肥料、工具、想到未來將要在那塊沒有房屋、沒有水、流行瘧疾的土地上渡過的日日夜夜，農民就會認識到他們的無能、孤獨和絕望的處境，他們就會成爲強盜而不是革命者，成爲'劫富濟貧'的綠林好漢而不是爲'工人'和'農民'的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戰士。"(3)

3 「工人和農民」，見「新秩序」1920年1月3日。

唯一能夠解放農民，並把他們造反的天性歸順到建設性的目的上來的方法，就是同城市革命的工人進行合作，根據義大利的現狀，這就意味著北部工業地區和南部落後不發達地區的聯合。它也是挽救義大利統一的方法。根據葛蘭西的觀點，正如義大利十九世紀復興時期中產階級曾是"全民族的"階級，是創造義大利統一的歷史工具一樣，今天，義大利無產階級也應成爲"全民族的階級"，它將使統一成爲社會和經濟現實。葛蘭西於1925年寫道：

"當北方無產階級強大起來時，就會出現革命的形勢；如果北方的工人階級是軟弱的，農民們將同小資產階級達成和約，同樣，義大利南方農民對義大利北方工人來說則代表着力量和革命的推動力。北方工人和南方農民是兩股龐大的革命力量...我們應將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他們這裡來。"(4)

很清楚，這一任務並不容易，在過去的數十年中，農民必須指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諸如小城鎮中的醫生、律師、藥劑師，尤為嚴重的是指望教會作爲他們的政治領導。如果共產主義者企圖打破這些傳統的勢力核心對農民的束縛，他們就不僅要在農民中組織革命的因素，在農村建立共產主義的基層組織，而且他們還必須實行迄今為止由資產階級和敵對的教士所實行的知識界的領導。

葛蘭西一直稱讚羅馬天主教的組織和宣傳。在1919年和

4 「給義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見巴奧羅·斯普里阿諾的「義大利共產黨史，從布爾迪加到葛蘭西」，第450頁。

1922年間，他曾有興趣注視人民黨——企圖在南方農民中建立的通俗和進步的天主教黨——的興起和衰落。如果共產黨打算成功地取代天主教運用其教義在農民中產生的影響，它就必須去競爭，不僅要創造具有同樣歷史重要性的意識形態，而且還要使自己成為等同於教士階層的知識分子階級，以便說服農民，使他們確信他們二者之間是緊密聯繫的，擁有共同的基礎、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願望。葛蘭西對爭取農民支持的必要性和對義大利南北方關係問題的反思，給他帶來這樣一些問題：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作用；歷史傳統和歷史變革的性質；統治集團在群眾中實施領導權的方法。這些問題將耗費他整個後半生的時間。1926年，當他被捕時，他正在為這些問題中的一些實質性理論問題進行研討，並提出了許多課題，這些課題在未來十年中都在他的獄中日記裡得到體現。當他被迫終止政治實踐時，以往在黨內的政治實踐經歷給葛蘭西的理論研究提供了基礎。

第七章 監 獄

1926年11月8日，安東尼奧·葛蘭西在去議會的途中，被墨索里尼的警察逮捕，議會打算通過保留死刑並建立特別法庭以審判政敵的法律。此前，葛蘭西曾拒絕了勸他到國外避難的建議，一直在羅馬過著半秘密的生活。他的妻子朱莉雅曾同他在一起生活了幾個月，但那時，朱莉雅已經同他的長子德里奧（Deio）一齊返回了莫斯科，其次子朱利亞諾（Giuliano）則在朱莉雅到達俄國後不久降生，他從未見過他的父親。

起初，葛蘭西被解往烏斯蒂卡島，在那裡還拘留著一些政治犯，其中包括布爾迪加，葛蘭西同這位老對手保持了最友好的關係。不久，他同布爾迪加一起把其他難友組成了一些小組。這個相對輕鬆的局面沒有維持多久，從烏絲蒂卡轉移到米蘭後，他同其他一些共產黨領導人終於被帶到新的政治法庭——“保衛國家特別法庭”——前受審。1928年6月初，他被判處監禁二十年。在十八個月的監禁後開始正式審判時，葛蘭西的健康狀況極度惡化，他被送往義大利南部巴里（Bari）附近的都里（Turi）的一所為病囚特設的監獄（儘管醫療設備差到極點）。直到1933年前，他一直被監禁在那裡。1933年，在他病入膏肓後，身體條件如此之差，又兼有國際上對他的聲援，因而才獲準將他轉到羅馬和拿波里之間的弗米亞（Formia）一家私

人診所，其後，又轉移到羅馬的一家條件稍好的診所，但這時，他的身體已經徹底垮了，1937年4月27日，就在基於疾病而釋放的赦令被簽署時，他與世長辭了。

據說墨索里尼曾命令："必須使這個頭腦二十年不能工作。"此話曾一再被公訴人重復。雖然，法西斯主義者沒有得逞。但是，法西斯主義者從一開始就對葛蘭西千般刁難。在允許他在監獄中寫作之前，有一段時間他的信件都受到嚴格的限制。但是，儘管如此，在囚禁期間，他仍舊成功地寫出三十三本札記（這些札記大約有2350頁），記載了他的歷史、哲學、政治和文學思想。他還給家裡寫了許多長信，生動地描述了他獄中的生活及其苦難，也描述了他的思想活動。大多數的信件都是寄給他妻子的姐姐，塔齊亞娜（Tatiana）的。塔齊亞娜留在義大利，並承擔起全力幫助葛蘭西的責任，她給他寫信，探望他，她還常常違背他的意願，通過一切法律的、政治的和私人途徑去爭取葛蘭西的釋放，或至少為他爭取適當的醫療條件。在葛蘭西給塔齊亞娜的信中，他發洩了他的憤怒、沮喪，也表達了他的希望、憂慮以及他的閱讀、研究計劃。他之所以能夠廣泛地閱讀和收到監獄當局所允許的書籍、雜誌（一旦允許他閱讀和寫作，對書籍和雜誌的限制在某種程度上說，還是相當寬鬆的），應主要歸功於他的朋友皮埃羅·斯拉法（Piero-Sraffa），他定居於英國，是劍橋大學傑出的經濟學家，他為葛蘭西在米蘭的一家書店裡開了一個帳號。

但對葛蘭西的隔離仍是相當嚴格的。實際上，他同以前的政治盟友沒有任何聯繫，這些人大多數不是被流放就是被拘禁

。葛蘭西對共產國際在托洛斯基失寵後所發生的危機反映甚微，有時甚至是模糊的。從他的難友以及他的一個兄弟相互矛盾的報告中，我們實際上也不清楚葛蘭西對那場大討論的態度。無產階級在法西斯主義滅亡後，能否像葛蘭西一度所確信的那樣，進行直接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或者能否像他在入獄前一直所思考的那樣，應返回到自由民主制度。這樣一場大討論導致了1930年義大利共產黨的分裂。在他從事積極的政治活動期間，我們必須時常從他的有關日常策略的文章中推論他的觀點，反過來，「獄中札記」和獄中的信件則討論了一些普遍性的問題和抽象的思想，很少涉及他現在無法參加的政治實踐活動。

葛蘭西在獄中的孤獨常常是痛苦的，他在給母親的信中說：

“儘管我終日閱讀和寫作，可是煩惱仍是最壞的敵人。這種特殊的煩惱並不產生於懶惰……而產生於缺乏同外界的接觸。我不知道您是否讀過有關聖徒和隱士生活的書，他們就被這種特殊的煩惱所折磨，他們將其稱為‘正午的地獄’，因為每當接近正午時分，他們就強烈地渴望改換環境，回到世界中去，去看看人們。”⁽¹⁾

同外部世界缺乏直接的接觸，迫使葛蘭西根據自己以往的政治和新聞活動來思考，並把它們同目前所閱讀的內容結合起來，以便在一個較長的歷史畫面和他本人最近政治經驗基礎上

1 1929年9月23日，給母親的信，引自「獄中來信」第153頁。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葛蘭西 66

形成一系列反思和文章。

他對他的記者生活並不滿意，他在給塔齊亞娜的信中說：
在當記者的十年中，

“我寫的東西可足夠編成十五到二十本厚書，每本均可達四百餘頁。但是，我相信每天寫出來的這些東西，過後立刻就會被忘掉。”⁽²⁾

他計劃著手寫一本重要的哲學或歷史學著作：

“...它是一部研究義大利知識分子歷史的著作，是關於他們的出身、以及根據他們和文化潮流的關係所做的不同的組合、他們的各種各樣的思想方式等等問題的著作...您還記得我的一篇論南義大利和B. 克羅齊重要性的短小精悍的文章嗎？是的，我願意詳細論述這個只有我接觸過的論點，從一個毫無興趣的觀點，關於永恆開始進行論述。第二，研究比較語言學，就是這些！...第三，研究皮蘭德洛及其所代表和促成的義大利戲劇風格的變化...第四，論述通俗小說和大眾文學的風格...這會使您多麼驚奇呀！真的，如果您仔細看過這四個方面的梗概，那麼，貫穿於其中的共同線索：人民大眾的創造精神，就會在其每一發展階段都同樣得到表現。”⁽³⁾

2 1931年9月7日給塔齊亞娜的信，引自「獄中來信」第203頁，（義大利文版，第480頁）。

3 1927年3月19日給塔齊亞娜的信，引「獄中來信」第80-90頁（義大利文版，第58頁）。

葛蘭西虛弱的身體和獄中困難的工作條件使他根本不能完成這些雄心勃勃的計劃。但是，這其中體現出來的思想在他的反思中占有核心地位，此後幾年，他將它們充實到了「獄中札記」裡。

第八章 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

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或如葛蘭西在「獄中札記」所說的實踐哲學，構成了他的思想框架。儘管“實踐哲學”這一短語，就如他稱列寧·伊里奇（本應為伊里奇·列寧——譯者註），托洛斯基·布隆斯坦和史達林以及很少引用的朱瑟佩·貝薩羅尼（實為約瑟芬·維薩里奧諾維奇，Joseph Vissarionovich）一樣，含有迷惑獄吏之目的，但實踐哲學這一術語仍精確地體現了葛蘭西的政治哲學思想，它應提供一種解釋世界的方法，指導人們的行動。但是，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卻極具個性。他從未完全拒絕克羅齊的歷史循環論，在「獄中札記」裡，他用大量的篇幅對克羅齊的思想進行了批判性的討論。葛蘭西的頭腦中似乎存在著一場列寧與克羅齊之間的永恆的對話，由於他同樣深受列寧的理論和實踐的影響，因而，他的許多概念都得益於列寧，諸如，其“文化霸權”的概念，就是他的歷史和政治分析中的核心部分，而這一概念就來自列寧。他曾主張：

“「新秩序」的立場基本上就是把按照共產國際的原則和策略要求制定的原理翻譯成義大利的歷史語言。”⁽¹⁾

1 「新秩序的綱領」，見「新秩序」1924年4月，「義大利共黨的建設」第21頁（都靈，1971年版）。

一般說來，他總是這樣對待馬克斯主義，因而，他比其他馬克斯主義思想家更清楚地了解馬克斯主義的歷史方面，更多地認識到了馬克斯主義的文化內容。他相信，對馬克斯主義的錯誤理解，在義大利社會黨的意識形態和實踐中產生了他所認為的災難性的影響，這就是，把馬克斯主義和實證主義以及粗糙、麻木的唯物主義相提並論。

我們可以根據葛蘭西「獄中札記」的一些章節看清楚他對歷史唯物主義，以及這一理論所導致的對歷史及歷史變革問題研究的態度。在這些章節中，他批判了蘇聯的一部關鍵性的理論著作即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這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通俗手冊」（這是它的副標題）第一卷刊行於1912年，葛蘭西所用的可能是1927年的法文譯本。他還知道布哈林一篇題為「從辯證唯物主義立場來看的理論和實踐」的著名論文。布哈林於1923年在倫敦召開的"國際科學技術史會議"上宣讀了這篇論文。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儘管本世紀二十年代初，布哈林確實代表著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傾向，但到葛蘭西在文章中談到他時，他已經被蘇聯的作家批判，而且幾年後，根據史達林的指令被判處死刑。就布哈林信仰自由的探討，信仰馬克思主義是活生生的、變化著的哲學——他曾寫道："如果馬克思主義停滯不前，那是十分奇怪的。"⁽²⁾——而言，他的觀點同葛蘭西的觀點十分相似。到1920年晚期，甚至在他的實際政策中，他得出的關於農民問題的觀點同葛蘭西也相差無幾。

2 引自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和布爾什維克革命」（倫敦，1974年版）第107頁，這部傑出的傳記著作在解釋布哈林的觀點時比葛蘭西更富於同情心。

但是，儘管葛蘭西對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一書的批判有時是不公平的（也許他並不直接了解當代關於布哈林觀點的討論，諸如捷爾吉·盧卡奇的論述），但是，葛蘭西給布哈林的著作所做的註釋卻為葛蘭西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他的思想活動和假設提供了有趣的證據。

葛蘭西對布哈林的批判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他反對布哈林把歷史學和社會學加以區分，反對他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種社會學理論而不是歷史理論的看法。第二，他反對布哈林像十九世紀實證主義那樣堅持把自然科學當作所有其它精神活動都應與其一致的模式。第三，他對布哈林企圖把辯證法降為力量平衡的機械法則抱有反感。葛蘭西在一段包括這三個方面的批判的文章中說：

"社會學企圖根據一種預先已有詳論的哲學體系，即進化論的實證主義這樣一種哲學形式來創造歷史和政治科學的方法...它變成了非哲學家的哲學，它企圖根據建立在自然科學模式基礎之上的標準，提綱挈領地描述和劃分歷史和政治事實。因而，它企圖像'預言'從橡子必然長出橡樹那樣的方法來'實驗地'確定人類社會進化的規律。庸俗進化論是（這種）社會學的基礎，這種社會學無法了解從量到質的發展過程的規律..."⁽³⁾

3 「獄中札記」第1432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426頁（英文版）。

也許事實上這是對社會學家——至少是對自孔德 (Comte) 和希爾伯特·史賓塞 (Herbert Spencer) 以來的社會學家——所從事的工作的不確切的描述。但是它卻足夠精確地反映了葛蘭西的觀點：歷史，而不是社會學，包括著所有其它的包羅萬象的學說，它杜絕了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機械論的觀點。由於克羅齊走得還不夠遠，也由於克羅齊拒斥馬克思主義，沒有看到如果哲學和歷史是同一的，那麼，其結果就是政治、歷史和哲學也是同一的。儘管在這些方面葛蘭西對克羅齊作了深刻的批判，然而，他還是追隨了克羅齊。

葛蘭西反對把歷史降低為社會學，把馬克思主義等於社會學方法，還與他的另一個基本觀點，即他的"唯意志主義"的信念相聯繫，這個信念就是：人能夠影響事件，歷史的發展並不是預先規定好的，在歷史的領域中，一個人並不必然能像預言從橡樹種子中將長出橡樹一樣預言歷史。這是反對布哈林觀點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理由。葛蘭西認為，基於經驗的統計規律基礎之上的社會學以及諸如此類的學說可能有一定價值。但是，他繼續說道，

"這一事實並沒有得到適當的強調，即只有廣大群眾對歷史學家和政治家所感興趣的問題……在根本上保持被動狀態時，統計學的規律才有可能運用於政治科學及政治藝術中。進一步說，把統計學擴展到政治科學和政治藝術領域會產生嚴重的後果，這就是用它來預見未來和行動過程。在自然科學中，統計學所能產生的最壞結果不過是產

生錯誤的、不恰當的結論，而這些結論在進一步的探討中可以得到糾正。...但是，在政治科學和政治藝術中，它完全可以造成難災性的結果，產生無可挽回的危害。的確，在政治學中，把統計學規律的假設作為具有必然性的基本規律，這不僅是一個科學的謬誤，在行動上，它也只成為實踐的謬誤。"(4)

(人們不禁想知道，他是否已經在頭腦中想像出蘇聯的一些災難性的後果。)

葛蘭西政治哲學的一個基本因素就是，革命以及為它所做的準備應包括群眾意識的深刻變革，因為從這以後，群眾將不再成為施政的被動參與者，而應成為制定措施的決定因素，在這些活動中，他們自身將成為積極的參與者。正如葛蘭西所說的那樣："這個使大眾的感情標準化的過程已不再是機械的和偶然的（而不是由環境因素和諸如此類的條件所產生的），而是成為自覺的和批判性的過程。"(5)當然，給「獄中札記」讀者留下的一個問題就是，由於他的文章是零散的和不聯貫的，葛蘭西從未處理他必須去處理的存在於他著作中的矛盾，也未遇到可能產生的反對意見。例如，葛蘭西認為人不再是統計學意義上的整體，而是他們命運的決策參與者，這樣一個觀點是如何同承認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要素的計劃經濟相協調的呢？當然，對葛蘭西來說，他對工廠委員會以及工業中的參與民

4 「獄中札記」第1429-1430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426頁（英文版）。

5 「獄中札記」第1430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429頁（英文版）。

主制的看法，應是使這兩者協調一致的。

葛蘭西批判布哈林企圖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科學的社會學基礎是因為他否認了歷史的方面，也因為他企圖把自然科學的範疇應用於人類行為。但是，葛蘭西還認為，布哈林錯誤地理解了辯證過程的性質和重要性。很明顯，布哈林對辯證法是馬克思從黑格爾那裡改造過來的這一看法感到窘迫。布哈林認為，辯證法正是馬克思過快地從唯心主義那裡接受過來的東西，如果辯證法要想在現代"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中找到棲身之所，就必須使自己成為更能被科學分析所證明的東西。按照葛蘭西的看法，布哈林幾乎沒有給辯證法留下什麼位置，並且，"以一種非常膚淺的態度"對待它。事實上，布哈林真誠地希望用科學的術語來重新解釋辯證法理論。因為，正如布哈林所說，即使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辯證法也帶有"目的論的傾向，這種傾向不可避免地同黑格爾基於精神的自我運動基礎上的公式相聯繫。"他確信，辯證法可以用純粹的科學語言來重新加以解釋：

"世界由多方面起作用的、相互對立的力量所組成。這些力量只有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能達到瞬間的平衡。那時，我們才有所謂'靜止'狀態，即這些力量的現實衝突被隱匿的狀態。但是，我們只要改變其中力量之一，那麼，這種'內在的矛盾'就會立即顯現出來，平衡就將被打破，如果再次達到新的平衡，它就將建立在一個新的基礎上。由此得出結論，'衝突'、'矛盾'，即作用於不同方向的

力量的對抗的定著系統運動。"(6)

在葛蘭西看來，這種重新解釋沒有說明任何東西，因為它仍然把世界分為可以用科學術語說明的部分和作為哲學和形而上學的對象的部分，並因而使哲學"蛻變為形式邏輯的亞種和繁瑣哲學。"(7)但是，在葛蘭西看來；馬克思主義總的觀點恰好是它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把思想和生活的各個方面——諸如歷史、哲學、政治學、科學——統一為一個單一的體系。他寫道：

"如果承認實踐哲學是開創歷史及世界思想發展史新階段的統一和獨創性的哲學，就必須把握辯證法的真正功能和意義。實踐哲學須達到這種程度，它應該超出傳統的唯心主義和傳統的唯物主義哲學，這些哲學是以往的社會的表現，同時也保留了它們活生生的內容。如果實踐哲學不獨立於其它哲學，那麼想通過達到和表現對舊哲學的超越來掌握新的辯證法是不可能的。"(8)

6 引自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和布爾什維克革命」第116頁。

7 「獄中札記」第1425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435頁（英文版）。

8 「獄中札記」第1425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435頁（英文版）。

葛蘭西的辯證法觀點在許多方面和黑格爾，也同樣和馬克思相一致。或者，用另一種方式來說，這種辯證法是布哈林的觀點和克羅齊的觀點的平衡。他本人似乎從三個方面來看待辯證法。⁽⁹⁾從最簡單的意義上說，它意味著一事物和它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諸如知識分子或黨的領導同群眾（對於群眾來說，黨既是指導者又是被指導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即意味著內在於所有歷史和政治過程中的永恆的對話。但是，其次，他以黑格爾的特殊方式來運用這一術語，即根據三段論——正、反、合——也即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來分析歷史的發展。"此外，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在札記中寫道，

"實踐哲學是對黑格爾主義的改造和發展。這種哲學已經（或正在試圖）從意識形態中片面和迷信的因素中解放出來。它是充滿矛盾的意識，在這種矛盾中的意識，即既被認作個人，也代表整個一個社會集團的哲學家不僅掌握了這種矛盾，而且也把自己作為一個矛盾的因素；並把這個因素提高為知識的，因而也是行動的準則。"⁽¹⁰⁾

在葛蘭西看來，這裡提出了辯證法的第三個意義，這一點對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核心問題——基礎和上層建築問題來說，具有極大的重要意義。葛蘭西一直攻擊那種庸俗的馬

9 見諾伯托·鮑比奧的「對葛蘭西辯證法的註釋」，引自「葛蘭西研究」。

10 「獄中札記」第1487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404-405頁（英文版）。

克思主義，它認為經濟制度、生產和交換方式直接決定著上層建築——諸如道德、法律、哲學、藝術，即整個精神領域。葛蘭西很不公正地把這種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與布哈林扯在一起。由於天性以及他的早期哲學素養的原因，葛蘭西希望用更精緻的術語來觀察歷史，也希望給觀念的影響以及給個人在歷史進程中的影響留有更多的餘地。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為黑格爾所謂從量到質的轉變建立基礎，也必須解釋物質條件的變化如何在人的意識中產生非物質的變化，這種變化又反過來影響未來的物質發展過程。葛蘭西強調，布哈林由於把量到質的飛躍局限在物質世界裡的事例上，

"滿足於水伴隨著溫度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形態（諸如冰、液體、氣體）、外部動因（火、太陽、碳酸的蒸發等）決定著純粹的機械事實這類文字遊戲...如果每一社會事物的總數都多於（或異於）它的組成部分的總數，這必定意味著說明社會發展的規律或原則不可能是物理規律，因為物理規律不能脫離量的範圍，除非是比喻。"⁽¹¹⁾

因此，辯證法不是物質力量的盲目衝突。它是一個運動，對於這個運動，人們可以通過深思熟慮，出於自己意願，在辯證的過程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一旦做到這一點，那麼向新

11 「獄中札記」第1446-1447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469頁（英文版）。

型社會、新型的意識飛躍的時刻就會到來。"每一個具有徹底破壞、徹底取代正題傾向的反題，都必須也必然把自己作為正題的固有的對立面。"(12)如果說葛蘭西發現布哈林的觀點太機械、太實證主義化，那麼，他也必須小心翼翼地將自己同克羅齊所持的觀點區別開來。克羅齊認為，辯證法不過是作用和反作用，挑戰和應戰，以至於新的歷史階段對某個歷史階段的全部否定成了毫無痛苦的改良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如同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所認為的一樣，意識形態的作用在於放棄政治鬥爭的形式和方法。另一方面，葛蘭西同早期黑格爾主義者巴枯寧 (Michael Bakunin) 一樣認為："破壞之力即是創造之力。"在葛蘭西看來，通向革命沒有平坦的道路。

在葛蘭西關於從量到質的轉變以及關於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的分析中，他牢牢地依據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經典著作，他認為這些經典著作被他們的某些後繼人，包括布哈林在內給低估了。他引用最頻繁的一部馬克思的著作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其中許多段落他可以倒背如流。馬克思在一段著名的論述中說：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的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的不會出現的。"(13)

12 「獄中札記」第1328頁。

13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3頁（中文版）。——譯註。

在葛蘭西看來，這段話似乎說明了各種歷史狀態的複雜性及其未知的可能性，因為，變革可能是緩慢的，新力量的發展也並不總是可以用預測的。此外，馬克思還談到了革命性的變革。

"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14)

恩格斯在晚年，也在一部為葛蘭西所了解的著作中談到這一種看法，"在參加者的頭腦中，對這些鬥爭的...反映...也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15)

因而，肯定地說，"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這種必然的相互作用就是真正的辯證過程，"(16)葛蘭西認為，他真正地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但是也許他比其它馬克思主義思想家

14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3頁（中文版）。——譯註。

15 參見恩格斯：「致約·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7頁（中文版）。——譯註。

16 「獄中札記」第1051-1052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366頁（英文版。）

更進一步認識到上層建築的重要性以及觀念在產生歷史變革中的作用，比其它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更清楚地認識到了不可能在經濟條件和精神發展中建立精確的相互作用的關係：

"聲稱每一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變化都可以作為基礎變化的直接地表現，並用它來代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假設，這種要求在理論上必定被指責為原始的和幼稚的，在實踐上必定遇到作為具體的政治和歷史著作作者的馬克思所提供的可靠證據的挑戰。"(17)

列寧曾經認為，在由經濟力量所定的歷史模式內，存在著許多波動變化的餘地：

"世界歷史是以數十年為計的。以世界歷史的尺度來衡量，十年、二十年左右沒有什麼區別：從世界歷史的觀點來看，十年、二十年是無法加以計算——即使是近似地計算——的小事。但是，精確地說來，正由於這個原因，把世界歷史的尺度應用於政治實踐中是極大的理論錯誤。"(18)

17 「獄中札記」第871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407頁（英文版）。

18 參見「列寧選集」（中文版）第4卷，第212頁，——譯註。

葛蘭西在他的「獄中札記」裡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毫無疑問，過去幾年的政治經驗和他對於歷史事例的研究對他的觀點產生了影響。他區分了兩種運動，一種是"有機的"運動——一種在社會中所具有的長遠趨勢；一種是"機緣性的"運動，"亦即表現為偶然的、迅速的、幾乎是突發的運動。"

"當開始研究某個歷史時期時，這兩種運動之間的區別之重要性就變得十分清楚了。一場危機發生了，有時它持續了數十年。這個持續時間非常之長的危機意味著無法治愈的基礎性的矛盾已經自我暴露了...但是，儘管如此，這也意味著為保持和捍衛現存基礎而奮鬥的政治力量...正千方百計在有限的範圍內挽救它們。這些持續不斷的努力就構成了'機緣性'運動的範疇...在政治歷史分析中，一個普通的錯誤就是不能發現有機的運動和機緣性的運動之間的正確關係，這就導致把事實上只能間接起作用的原因看作是直接起作用的，或是把當下起作用的原因斷定為唯一有效的原因。"(19)

試圖分析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並試圖對兩種解釋——基礎上的解釋和機緣的解釋——之間的關係加以描述，使葛蘭西提出一個非常重要（即使有點模糊）的觀念，即"歷史的紐結"的觀念。葛蘭西試圖借助這個字眼來描述這樣一種時刻，

19 「獄中札記」第1579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177-178頁（英文版）。

即主客觀力量結合起來，形成了革命變革的形勢；舊制度的經濟基礎正在土崩瓦解，而人民也具有了超越舊制度的願望、決心和歷史的洞察。葛蘭西描述歷史的紐結這一概念的方法就是："精確的物質力量是歷史的紐結的內容，意識形態是它的形式。"⁽²⁰⁾此外，他還寫道，"基礎和上層建築形成了'歷史的紐結'。"⁽²¹⁾他相信，認識到客觀的物質力量的發展達到有可能發生革命的地步，要依賴於正確的理性分析，也依賴於包羅萬象的意識形態，這個意識形態將"對基礎的矛盾做出理性的反映，並（表現）革命實踐客觀條件的存在。"⁽²²⁾

葛蘭西似乎還認為"歷史的紐結"在個性發展中具有心理學上的重要意義，同時，在社會的發展中，有時也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義。他運用該術語來描述"自然和精神的統一（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統一）、對立的統一和差別的統一。"⁽²³⁾他似乎還把這種統一在心理上的實現看作一個辯證過程，這一過程似乎與人們對外部世界的事件進程產生影響的辯證過程相似。他寫道："人創造其自己的人格：

"1. 借助於把特殊的人格和具體的（'民族的'）傾向輸入

20 「獄中札記」第869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377頁（英文版）。

21 「獄中札記」第1051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366頁（英文版）。

22 「獄中札記」第1051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366頁（英文版）。

23 「獄中札記」第1569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137頁（英文版）。

到他們自己生命力或意識中。

2. 通過發現可以使這種意志具體化、特殊化而不是隨心所欲的方法。
3. 通過致力於改變具體條件的總和以便在個人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用最豐富的形式來實現這種意志。人被看作一個歷史的紐結，他既是這個集團的純粹個人和主觀的因素，也是它的群眾的和客觀的或物質的因素，個人同這個物質因素之間具有一種積極的聯繫。"⁽²⁴⁾

24 「獄中札記」第1338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360頁（英文版）。

第九章 知識分子；馬基維利；

文化霸權

葛蘭西對意志力的信仰並不僅僅反映在他不顧艱苦的監獄生活和疾病所帶來的痛苦以及他在不斷地進行思考、閱讀和寫作中表現出來的堅韌不拔的精神上，也反映在他對心理分析的評論中，反映在他給住在莫斯科並患有間或復發心理疾病的妻子的建議中，他對弗洛伊德感興趣，並了解弗氏的一些理論，但是他認為，這些理論的適用性是十分有限的。在給其妻子的姐姐的信中討論到他妻子的疾病時，他說，"當然，我的心理分析知識既不豐富，也不精確，

"但我想，在我所研究的極少的知識中，至少有些地方我可以明確地談出我的觀點...最重要的一點似乎是：心理分析療法只能有助於浪漫文學素來稱之為被侮辱和被傷害的人'這樣一些社會因素...這些個人陷入現代生活的殘酷矛盾中...簡言之，這些人無法克服這類對抗性的矛盾，不能達到新的道德上的寧靜和平衡，即不能達到意志的推動和個人可以達到的目的之間的平衡。在歷史之某一確定的時刻和某一確定的環境中，即形勢的高熱化達到極

度緊張的候，聚集起來的巨大力量釋放出來，對獨立的個人形成極大的壓迫，這時，形勢就變得戲劇化了...這種形勢對感覺特別精微和特別敏感氣質的人是災難性的...因而，我相信，那種有文化的、作為社會中的積極因素（當然，就像朱莉雅一樣...）的人是而且必定是他自己最好的精神分析家。"(1)

在此後的一封信中，他詳細論述並修改了他的人類心理的辯證觀點，並指出心理危機並不僅僅對"被侮辱和被傷害"的人有影響，當社會的要求同"建立在舊習慣的殘餘和舊思想方法基礎上的'個人'行為傾向"相衝突時，這種危機也會產生。這種緊張如果不能消除——諸如通過懷疑論和偽善的方式來迎合社會的要求——

"那麼，這個問題就只能通過災難的方式加以解決，因為它引起被壓抑情緒之病態的渲泄，對這種情緒，必要的社會'偽善'...只能使它麻木並使它潛入下意識層"(2)

對於弗洛伊德主義概念——諸如壓抑、無意識——的有限接受，在葛蘭西這裡，同黑格爾的理論的觀點結合了起來。黑格爾認為，在理想社會中，國家法同個人意識或意志的命令相

1 1923年2月15日給塔齊亞娜的信，引自「獄中來信」（義大利文版）。

2 1923年3月7日給塔齊亞娜的信，引自「獄中來信」第584頁（義大利文版）。

一致。但是——在此，人們不能不感到這是葛蘭西自己獄中經歷的直接產物——"一個人即使是在最荒誕的矛盾和根本無法改變的必然性之壓抑的衝擊下，也可以達到某種寧靜。"在這裡，我們將返回到葛蘭西哲學的核心之處：

"但是，一個人如果成功地進行'歷史的'辯證的思考，而且把自己的工作視為理性的、非情緒的活動時，他就能達到這一點...借助這些感覺...一個人就能夠因而也必定成為'他自己的醫生'"(3)

一個人只要對他的行為所可能產生的後果有明確的認識，他就有可能影響其自身的發展和所處的環境。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認識自己所處的歷史環境，而一旦他做到這一點，他就可以成為改造環境的積極因素。行動的人是真正的哲學家；而真正的哲學家必然，也必須成為行動的人。

"一個人並不是由於他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同自然界發生關係，而是通過工作和技術的方法和自然界發生積極的聯繫。進一步說，這種關係不是機械的，它們是積極的和有意識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在改變和規定自己，因而我們也在改變和規定著那些以我們為核心的複雜關係。根據這種思想，真正的哲學家是，也只能是政治家，是行

3 1923年3月7日給塔齊亞娜的信，引自「獄中來信」第584頁（義大利文版）。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葛蘭西 88

動的人，這個人在通過環境認識我們每一個都參與其中的整體關係的同時，也規定著他的環境。如果一個人的個性就是這些關係的整體，那麼，創造自己的個性就意味著擁有對這些關係的自我意識，而規定自己的個性就意味著規定這些關係的整體。"(4)

葛蘭西確信，在政治活動和個人行為兩個方面，只有通過歷史的意識和歷史的分析，通過對社會和個人所處的精確的歷史環境的了解，人們才能清楚地認識他改造環境和改造自我的能力。

正是由於保持了這種歷史意識，亦即認識到對自身以及對所處的社會來說什麼是正確的過程，正是由於這一點才使得知識分子的作用在葛蘭西的革命變革理論中擁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葛蘭西對於知識分子的作用和性質的探討並不總是易於理解的。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他從兩個方面運用這一術語。一方面，他在通常意義上使用知識分子一詞，亦即把他們作為這樣的知識分子，（其任務是）為大眾提供哲學和意識形態，並通過提供為一般民眾所接受的信仰體系來使民眾不致於對統治者的行為產生懷疑，因而使統治者能夠行使他們的"領導權"；另一方面，葛蘭西也寫道，在某種意義上，每一個人都是知識分子。通過行使某種技能，通過一定的語言知識，每一個人都證明了他可以起知識分子作用的能力。

4 「獄中札記」第1345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352頁（英文版）。

"每一個人...都執行了知識分子作用的某種形式，這就是說，他是一個"哲學家"、一個藝術家、一個具有某種愛好的人，他同某種特定的世界概念相聯繫，具有某種道德情操的思想方針，並因而致力於保持某種世界概念或者去改造它，也就是說，形成新的思想模式。"(5)

但是，如果每一個人都是知識分子，那麼，如何說明知識分子階級的存在並規定其作用呢？葛蘭西的回答似乎是要區別兩種知識分子：一種是作為人類存在，他們不可避免地具有知識分子的某種面貌（因而被看作知識分子的人）；另一種人則行使知識分子的某些特殊職能。"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在社會中，並非所有的人都具有知識分子的職能。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所有的人偶爾也炸幾個雞蛋或在衣服上縫塊補丁，但我們並不必然就說所有的人都是廚師或裁縫。"(6)在分析那些執行某種特殊社會職能的知識分子時，葛蘭西做了另外一種有時很難理解的區別——"傳統的"和"有機的"的知識分子之間的區別。"傳統的"知識分子是那些我們通常認為在給定的社會中執行知識分子之領導任務的人們，而"有機的"知識分子則多少更緊密地同其所屬的階級相聯繫。作為傳統的知識分子的例證，葛蘭西引證了教士以及他們同中世

5 「獄中札記」第1550-1551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9頁（英文版）。

6 「獄中札記」第1551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9頁（英文版）。

紀封建統治階級的關係。他們似曾是一個"有機的"知識分子階級。他寫道："牧師這個範疇可以被看作有機地依附於擁有土地之貴族的知識分子範疇。"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曾經履行某種有機職能的知識分子集團，逐漸脫離了同某一特殊階級的聯繫，並"作為自治和獨主於社會統治集團的力量來推動自身前進。"⁽⁷⁾就天主教來說，儘管它與之聯合並為其行使職能的統治階級發生了變化，但它都可以生存，這似乎應歸功於上述原因。葛蘭西在其它地方還指出，教會之所以有力量，就在於它的較高的知識分子階層沒有同下層相分離。正由於這種情況，才使教會得以允許通過幾乎無法察覺的步驟，改善教規以迎合新的科學和哲學觀念的要求。但是，在社會動亂時代，當教會對群眾的掌握被削弱時，從葛蘭西的角度來看，由於教士僅僅為維護社會秩序而給群眾提供（精神）鴉片，由於神父們同社會秩序間已不復存在有如中世紀那樣的有機聯繫，因此教會的作用就變得十分模糊。正如經常發生的事情一樣，這是葛蘭西「獄中札記」裡未能加以詳述的許多題目之一，因而，任何概括他的觀點的企圖，也必定基本上是種猜測。

但是，當葛蘭西談到"傳統的"知識分子而不是那些教士的時候，他常常相當清楚地談到，正是在克羅齊的頭腦中，"整個唯心主義哲學都有可能易於被定義為某種社會烏托邦的表現。在這種表現中，知識分子們把自己看成是'獨立的'、自由的，並且有自己的個性。"⁽⁸⁾但是，這種獨立感當然是一種幻覺

7 「獄中札記」第1515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7頁（英文版）。

8 「獄中札記」第1515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8頁（英文版）。

。克羅齊和其他自由主義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們都不可避免地同他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階級結構相聯繫，並且像天主教教士緊緊依附於封建貴族一樣，他們也依附於工業家即他們這一時代的統治階級，並且他們還是自由主義時代的代言人。

這種傳統知識分子的真正職責，按葛蘭西的意思，應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規定的那樣自我決裂並加入到革命階級，即"掌握自己未來的階級"的行列來。因而，有機的知識分子似乎就是那些了解歷史運動方向的傳統的知識分子，他們被革命階級推舉出來作為其領袖。葛蘭西即使在其理論性最強的論述中也一如既往地根據自身的經歷或他所熟悉的具體的歷史事例來進行思考。同革命階級有著有機聯繫的知識分子，因而便成為領導該階級的政黨成員。它的作用從根本上說是實踐的：

"新型的知識分子已不再是雄辯家，不再是煽動人們的感情和情緒的外部 and 瞬間活動的煽動者，而是作為締造者、組織者、'永恆的推動者'而不僅僅作為說客來積極地參加實踐生活。"⁽⁹⁾

但是，正如1919年都靈工廠委員會運動時一樣，（今天）乃然存在著如何把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把黨和群眾聯繫到一起這樣一個理論問題。正如葛蘭西所說：

9 「獄中札記」第1551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10頁（英文版）。

"實踐哲學的立場是天主教教義的對立面。實踐哲學不想把'樸素性'留在常識性的粗糙的哲學中，而要引導這種哲學達到較高的生活概念。如果說實踐哲學肯定了知識分子同'樸素性'之間聯繫的必要性，那麼，它並不是為了限制科學行為，把統一保持在民衆的低水平上，確切地說，而是為了建立一個知識界的道德集團，這一集團不僅在政治上使知識分子小集團的精神進步成為可能，而且可以使民智進步成為可能。"(10)

革命黨以及作為其領袖的識分子的作用，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同初期天主教教會的教士一樣，那時，他們可以維護"整個社會集團意識形態上的統一，而這種意識形態又用來鞏固和統一該社會集團。"(11)

知識分子的影響一方面表現在當代革命鬥爭中，他是政黨的積極分子；另一方面表現在他是以往的歷史變革中的要素。知識分子的影響取的於他同群眾的聯繫，喪失這種聯繫，他就會像葛蘭西經常運用的比喻所形容的那樣，成為沒有後備軍的先鋒隊，成為沒有士兵的將軍（事實上，他就會處於葛蘭西認為布爾迪加於1923年冒險領導義大利共產黨所處的地位）。歷史並不是由"獨立於群眾的知識分子的傑出人物"所創造的，而

10 「獄中札記」第1384-1385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332-333頁（英文版）。

11 「獄中札記」第1380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328頁（英文版）。

是由"自覺地意識到同民族大眾之間存在著有機聯繫的知識分子們"創造的。葛蘭西寫道：

"一個人必須為反對...虛假的英雄主義和虛假的貴族政治...而鬥爭，並且鼓勵形成單純的、緊密的社會集團，這一集團將產生其知識分子、突擊隊和先鋒隊，它們又反過來作用於這些社會集團，使它們得到發展。"(12)

在葛蘭西被捕之前，他曾樂觀地制定了一項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龐大規劃，其中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知識分子在義大利歷史和義大利社會中的作用。雖然他未能對這個自己曾希望探索的題目進行充分、系統的研究，但是，他對義大利歷史的反思卻在「獄中札記」的大量篇幅中反映了出來。很自然，他關注義大利歷史上那個較為晚近的革命時期，關注義大利十九世紀的復興，關注義大利統一的產生以及義大利自由主義的出現。但他也迷戀於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思想和歷史發展，尤其是馬基維利這個人物。

本尼德特·克羅齊曾稱馬克思為"無產者的馬基維利"(13)
(14)葛蘭西以這一看法為出發點，決心把馬基維利曾經運用於十六世紀義大利的分析方法運用於當代社會。「獄中札記」的

12 「獄中札記」第1676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204-205頁（英文版）。

13 B.克羅齊：「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第112頁（巴里，1921年版）。

14 馬基維利（Machiavelli；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義大利政治家

許多篇幅都是用來書寫"馬基維利註釋"，在重新起草這些註譯時，對其中的某些內容做了不同的修改。葛蘭西由於患病以及監獄生活的妨礙未能完成的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就是寫一部「現代君王論」，這本書將為二十世紀提供一種政治模式或神話，而這種模式或神話早在四百年前馬基維利就曾在「君王論」一書中提出過。但是，在二十世紀，作為政治變革之先驅和執行者的君主的作用應由政黨來實施：

"現代君主，即君主的神話，不可能是某一個真實的人，一個具體的個人，它只能是一個有機組織，一種複雜的社會因素，由於它的存在才可使集體的意志...採取具體的形式。這種有機組織已經在歷史的發展中產生了出來，這就是政黨，即（社會中）最首要的細胞，在這一細胞中，集體意志之萌芽聚集起來，力圖成為普通的和無所不包的（東西）。"(15)

正如馬基維利的目的是教育他那個時代的統治階級並強迫他們面對義大利的政治任務這一現實而不受教會教條的限制一樣，"現代君王"也應教育無產階級，並鍛鍊他們使其成為未來的統治階級。葛蘭西寫道："馬基維利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把政治

，著有「君王論」、「佛羅倫斯史」、「論李維」等名著。他不但是位偉大的思想家，更是歷史哲學的奠基人之一。

15 「獄中札記」第1558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129頁（英文版）。

和倫理學區分開來。"(16)或許毋寧說，他使政治擺脫錯誤的倫理內容，以使政治領袖可以推動社會前進，使社會倫理和政治可能重新協調起來，而且將不再發生衝突。"政治（因而）被理解為一個向道德發展的過程，即它致力於發展一種將使政治和道德都得到超越的聯繫形式。"(17)在這裡，葛蘭西再一次向黑格爾的在公共法律和個人良知可能不發生衝突的社會圖景靠近。

上述這些是葛蘭西在準備向縱深發展的一個觀點，他對這一觀點的解釋表明他同自由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社會觀相去甚遠。他一次次用十九世紀社會思想家所喜歡的用語強調：任何政治和經濟的改革都必須伴隨"精神和道德的改革"。這個改革的目標將為同"現代君王"即共產黨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念的人和其自身的每一個成員所接受。

"當現代君主得到發展時，它將使整個精神和道德關係體系革命化。這一發展過程恰好意味著：任何一個給定行為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只有看它的出發點是否依據現代君主本身，是幫助現代君主加強其力量，還是反對它。在人們的意識中，君主擁有神聖的絕對命令的地位，它成為現代世俗文化以及生活的所有

16 「獄中札記」第749-750頁（義大利文版）。

17 「獄中札記」第750頁（義大利文版）。

方面和習慣關係的所有方面世俗化的基礎。"(18)

政黨的目的就是創造新的政治意志，而這一點，至少在葛蘭西寫作「獄中札記」時，他還認為將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正由於這個原因，在二十世紀，革命將由集體而不是個人來發動，因為個人行為"秉其自然，不能維持長久並缺乏有機性。"(19)由於葛蘭西對義大利歷史尤其是近一世紀歷史的反思，使他認識到，這一革命過程比1919年和1920年沈重壓迫下的事件的進程還要慢得多。結果，他提出了一種理論，認為歷史的發展，尤其是革命的發，是積極的和消極的兩個階段交替進行的過程。法國革命的劇變和拿破侖時代都代表著積極的革命階級，但伴隨而來的則是消極時期。1848年，再次出現積極革命時期，該世紀後期，尤其在1870年後，社會變革則又採取了不同的形式。"正如在軍事藝術中一樣，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政治藝術中。"葛蘭西運用他所喜歡的一個軍事上的比喻寫道，"運動戰(the war of maneuver)逐漸變成陣地戰(the war of position)，人們可以根據和平時期的精心的技術準備程度來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可以贏得戰爭。"(20)在葛蘭西領導義大利共產黨期間，他一直關注為黨創造群眾基礎，並創造可以使黨的領導決策為廣大群眾接受和理解的形勢。現在，當他把黨作

18 「獄中札記」第1561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133頁(英文版)。

19 「獄中札記」第1558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129頁(英文版)。

20 「獄中札記」第1566-1567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243頁(英文版)。

為"現代君主"來分析其作用時，當他對馬基維利的歷史作用和十九世紀義大利的歷史進行反思時，他提出了一套更為理論化的途徑，一種可以發動革命的策略。根據這種策略，陣地戰同運動戰一樣重要。為了使革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是清楚地區別兩種不同形式的戰爭。根據這一觀點，葛蘭西批判了"不斷革命"論，他將這一理論追溯到1848年的革命，而這一理論則尤其與托洛斯基聯繫起來。他拒斥在革命過程中不可能存在間歇以及在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之前出現間歇將導致致命後果的觀點。

"('不斷革命'的)公式只適用於一個歷史時期，而這時不存在人數眾多的群眾性的政黨以及龐大的經濟共同體，即可以說這時社會仍處於動盪不定的狀態，"(21)

此後，由於中央集權國家的權力以及群眾組織的增長，不斷革命的觀點就被葛蘭西稱之為"公民文化霸權"的觀念所取代。這種文化霸權的建立是所有統治階級的成功和生存的基礎。這一觀點是葛蘭西政治思想的核心，革命黨，即現代君主的任務就是要建立這樣的領導權，如果有必要，在"消極革命"時期或者說"陣地戰"時期，可通過使民眾的觀念得到緩慢的改進來建立這樣的領導權。

在葛蘭西"文化霸權"思想的發展過程中，他直言不諱地承

21 「獄中札記」第1566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243頁(英文版)。

認他受益於列寧。葛蘭西認為，由於列寧在堅持黨的任務是使群眾清楚黨的政策之意識形態基礎，以便使他們免受"經濟主義"和直接的實際經濟目標的誘惑時，強調在發動革命的過程中思想意識變革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哲學上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葛蘭西寫道：

"列寧只是在發展政治學說和實踐時才推動了哲學本身的發展。權力工具的實現只有在它創造了新的意識形態領域，並決定著意識以及知識方法的變革時，才能作為一個知識的事實，一個哲學的事實。用克羅齊式的話來說，這就是，當我們成功地採用一種新的符合於新世界觀的道德觀念時，我們便最終採用這個新的世界觀，由此便開始了整個哲學的改革。"(22)

事實上，列寧在他的經典著作「怎麼辦？」以及「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是否這樣講過，還是值得爭論的，但葛蘭西毫不懷疑，通過觀念改革的途徑確立文化霸權的思想是列寧對馬思主義理論的一個重大貢獻。通過直接運用克羅齊的語言來重述列寧的思想原則，以便檢驗它，這也是葛蘭西思想方法的一個特徵，因此，他的領導權學說似乎也得到了這兩位大師的承認。

在葛蘭西看來，一個政治階級的文化霸權意味著該階級成

22 「獄中札記」第1250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365-366頁（英文版）。

功地說服了社會其它階級接受自己的道德、政治以及文化的價值觀念。一個成功的統治階級正如以往十九世紀成功的自由體制一樣，將最少訴諸武力。

"文化霸權在傳統的地區，即議會制度地區的'正常'實施，其特點在於將武力和民意結合起來，這種結合調解著武力與民意雙方的平衡而不會過多地超出民意運用武力。因而它竭力做到使武力的運用看起來應得到大多數意見的支持並由所謂公共輿論機關——報紙、協會等——來表達...當民意和武力間存在著腐敗墮落和爾虞我詐時（它表明這樣一些情況，由於過分危險地使用了武力，因而使得領導權的實施變得十分困難）。(23)

在危機期間，諸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領導機構趨於崩潰，黨趨於分裂，沒有任何一個集團能夠得到民意以行使統治。對於權利的更替、新的領導機構的創主以及為民意尋求新的基礎或假定尋求由武力支持的政府來說，形勢已經成熟。

一個成功的統治階級，就是那個在實際上取得政治權力之前就已經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領導地位的階級。為了做到這一點，它必須擁有一個可以作為核心的領導集團，而該集團又有能力從社會其它集團中獲得支持。葛蘭西列舉了義大利十九世紀復興運動中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的事例，這些人在當時既能在

23 「獄中札記」第1638頁（義大利文版）。

知識分子中，也能在人民群眾中尤其是農民中獲得支持。此外，統治集團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尊重其它集團的利益。

"文化霸權的行使毫無疑問在行使該文化霸權時必須考慮被行使集團的利益和傾向，還要確實存在著協調平衡；並假定統治集團應為某種經濟合作方式付出代價，但是，同樣無可懷疑的是，所付出的這些代價和所做出的這種妥協不會（對統治集團）產生根本性的影響"。(24)

因此，在奪取文化霸權的過程中，似乎應存在兩個階段，每一階段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正如我們所了解的，這將是一個通過"陣地戰"來進行準備的長期過程。在這一時期裡，逐漸確立了某一社會集團的文化及意識形態的文化霸權。在該時期裡，黨將同其它社會集團合作，做到在某種程度上尊重這些集團的利益，並對他們的要求做出讓步。對葛蘭西來說，這一過程像所有歷史變革過程一樣，知識分子的作用是絕對重要的，因為，奪取和保持文化霸權主要是教育的事情。他說，"同文化霸權之間的所有關係必然是同教育學之間的關係"。(25)該教育過程的成功程度將由新的民意，或用葛蘭西的話來說，由"集體的民族的意志"之確定程度來表示。以往，在義大利正是由於缺乏這種意志，才使得它被排除於歐洲歷史的許多重要

24 「獄中札記」第1591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161頁（英文版）。

25 「獄中札記」第1331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350頁（英文版）。

發展過程——諸如宗教改革運動之外。為了產生這樣的意志並形成可以創造一個新社會的"民族大眾集團"，知識界的領袖就有必要緊密聯繫群眾，他們的觀點就要接受一般觀念的檢驗。葛蘭西寫道：

"知識分子的錯誤在於他們相信沒有理解，尤其是沒有感受，沒有激情也可能進行認識...（也在於）他們認為即使同民族大眾相區別、相脫離，感受不到人民群眾的滿腔熱忱，不能理解他們，不能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對他們做出解釋和說明，不能把他們同歷史規律，也就是優秀的世界觀辯證地聯繫在一起...知識分子仍舊可以是知識分子...（但是），沒有激情，沒有知識分子與民族大眾的感情聯繫，就不會產生歷史和政治。缺少這種聯繫，知識分子和民族大眾的關係就降低為純粹官僚式的、形式性的關係；這樣的知識分子就會成為特權者或成為神父... " (26)

因而，知識分子的作用一方面同民眾信仰及民眾感情的性質相聯繫，另一方面也同政黨內部的整個民主問題相聯繫。葛蘭西以往對通俗文化的興趣，現在同他在都靈工廠委員會時期所關注的問題，同把領導者和被領導者團結起來的需要相聯繫，而領導和被領導者的團結又必須靠葛蘭西用於多種目的所

26 「獄中札記」第1506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418頁（英文版）。

謂"歷史的紐結"來實現。在上面引述的那段文字中，葛蘭西繼續說道：

"如果知識分子和民族大眾，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關係是有機的聯繫。由於這種有機聯繫，（雙方的）感受和情緒才能得到相互理解，那麼，那時，也只有那時知識的……聯繫才成爲代表性的聯繫。只有那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才能進行交流。這就是說，共同生活的實現，僅僅作爲一種社會的力量，只有那時，才能產生'歷史的紐結'。"(27)

此外，葛蘭西還強調執政黨和群眾之間必須具有流動性。"在文化霸權制度中，領導集團和被領導集團之間存在著民主，這種民主將導致經濟的發展和表現經濟發展的立法的發展，這些發展均有利於被領導集團成員向領導集團過渡。"(28)葛蘭西懷疑並討厭官僚主義，他把官僚主義看作是使一個政黨僵化乾癟、落後於時代的巨大的威脅。毫無疑問，他回顧了兩種官僚主義，一種是在他從事政治活動時期義大利社會黨曾經具有的特徵，而他同時又擔心另一種官僚主義的威脅，這就是義大利共產黨內布爾迪加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爲，領導者應當是脫離群眾的、自封的傑出人物。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對這

27 「獄中札記」第1505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418頁（英文版）。

28 「獄中札記」第1056頁（義大利文版）。

方面問題的討論在這裡進一步向普遍化甚至向抽象化的方向發展，這些問題也是他在其政治活動生涯中一直關注的問題。當他觀察當代義大利官僚主義時，他認識到官僚主義大部分表現在小資產階級身上，而這一階級——尤其是南義大利小資產階級，也就是葛蘭西的父親所從屬的那個階級——的反複無常和機會主義的特徵使得葛蘭西一直對它抱有深深的懷疑。葛蘭西認爲，這些人會不惜任何代價決心保持其社會地位並阻止社會的變革。他厭惡和懷疑官僚主義以及官僚主義者，他認識到無論是國家還是政黨，政黨在那些國家不能直接控制的地區履行職能，都需要某種性質的行政管理。這種行政管理必須是活的、民主的、不偏不倚的。怎樣才能造就這樣一些品質，這是葛蘭西非常清楚地認識到而又沒有發現精確答案的一個問題。但是，他提出答案應在——這裡，他的說法也很像1919年和1920年他曾擁護的——"民主集中制"的形式中，他寫道：這種形式，

"是一種'動態的'集中制，是不斷地把組織活動應用於真實的運動過程，是把下面的壓力和上面的領導結合起來的過程，是把底層的群眾因素納入領導機關的堅強結構中的過程，而這一機構將保證連續性的日常的經驗積累。"(29)

葛蘭西認爲這種集中制作爲"官僚的"集中制之對立面將產生一

29 「獄中札記」第1634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188-189頁（英文版）。

種"有機的集中制"，而官僚集中制中的統治集團則千方百計使自身及其特權永恆化。應該承認，葛蘭西的公式採用了黑格爾式的語言，保留了形而上學性。

"民主集中制提供了一種活的制度，這一制度使自身得到多方面的表現...它是一種批判性的探索，即一方面在異中求同，另一方面在同中求異甚至是對立，以便緊密聯合和聯繫相似的屬性，但是，根據這一方法，聯合和聯繫應具有實踐的和'歸納的'必然性，應是實驗的而非理性抽象演繹過程的結果，而這種演繹制是腐儒（或愚人）的特徵。"(30)

像索萊爾一樣，——這裡，葛蘭西似乎是在摹仿索萊爾——葛蘭西在抨擊知識分子時，卻最具知識分子特徵；在讚成具體時，卻最為抽象。但是，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似乎同三十年後中國的毛澤東主義付諸實踐的那些思想類似，那時知識分子被迫從事階段性的體力勞動。"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統一，立法權和行政權的緊密聯繫（因而，被選舉出來的公職人員不僅關心國家事務，而且也關心其效果）就會成為推動力以激勵人們尋求新的手段，以解的知識分子以及公職人員的問題。"(31)

30 「獄中札記」第1635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189頁（英文版）。

31 「獄中札記」第1632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186頁（英文版）。

第十章 現在和未來

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更為關心的是分析過去和探索歷史的規律而不是描述未來具體的行動過程或規劃新社會的細節，該社會從葛蘭西當時所處的環境來看似乎還相當遙遠。因而，他相信，革命的道路依然相當漫長，資本主義制度距離其崩潰還相當遙遠。他逐漸增加了對美利堅合眾國的關注，他認為在這個國家中，資本主義似乎最為成功地適應了二十世紀的要求。「札記」收集了他的一些筆記，其中許多是以前筆記的複本或改寫，他給這些筆記冠之以"美國主義和福特主義"。

葛蘭西認為，美國的工業家的確比歐洲的工業家更有某些優勢，因為葛蘭西認為，一方面美國的工業家可以在一個較為簡單的社會結構中從事活動，這一結構的某些方面同歐洲早期的社會結構相似，但是，同時，美國的社會結構又擁有現代的先進組織和先進技術，他敏銳地觀察到，美國在很大程度上同十五世紀早期亨利·德·聖西門所預言的社會相同。他看到，諸如作為現代右翼聖西門主義（Modern Saint-Simonianism of the Right）的扶輪社主義（Rotarianism）⁽¹⁾就贊同"在工業和貿易成為商業之前就是社會服務事業"⁽²⁾的觀點。

1 扶輪社，是富有的商人領袖及專門職業者的地方聯誼性組織，該社於1905年創建於美國芝加哥，後發展成國際性組織。——譯註。

2 「獄中札記」第541頁（義大利文版）。

美國同歐洲、尤其是義大利相比較，一個重要的優勢之處就在於，美國只有極少數人不直接參加生產過程。葛蘭西寫道：在美國，

"生產領域中不存在人數衆多的脫離實際生產職能的階級，這一階級完全是個寄生的階級，相反，歐洲的'傳統'，歐洲的'文明'是以存在這樣一些階級為特徵的，這些階級產生於所謂'富有'和過去歷史中的'複雜現象'。在歷史中，通過國家官員、知識分子、教士、地主、掠奪成性的商業、軍隊的過份飽和以及腐化，便留下這樣一堆消極的沉渣...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個家的歷史越悠久，則這類靠'祖先'的'遺產'，靠經濟史上遺留下來的津貼生活的游手好閒的無用之人所構成的沈渣就越多，就越成為負擔。"(3)

相反，美國則不必承受這些負擔。儘管葛蘭西看到美國商人的妻子和女兒正在逐漸變成這種無用的階級，但是，他仍然相信，美國的工業家可以保持他們的利潤率，因為他們不必負擔無數的搶客和寄生蟲。美國的工業家直接就是統治階級。"文化霸權就誕生於企業，而文化霸權的實施則很少需要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媒介。"(4)

3 「獄中札記」第2141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281頁（英文版）。

4 「獄中札記」第2146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285頁（英文版）。

同時，作為企業中新的勞動組織方法的先驅，亨利·福特的思想和實踐，以及工程師福利德利克·W·泰勒——他為工廠的勞動組織管理開闢了一種新的方法——的學說都可以保障實現高生產率。付給技術工人們以高工資，並盡力去控制工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這樣便可使資本家獲取較高的生產率。葛蘭西認為，禁酒令的推廣不過是因酗酒會浪費大量工時，使工業家的利益受損之故而頒佈的。在福特的工廠裡，工人的性行為受到周密地監視，以保證不影響工人的效率。儘管這一過程沒有持續多久，但有跡象表明，勞動的運用以及生產方式的合理化導致產生"符合新型勞動和新型生產過程之新型人類的必然性"⁽⁵⁾。根據這種觀點，新型資本主義人的進化延緩社會主義人的發展。

有趣的是，葛蘭西認為，對管理合理化及其效率的強調，相似於本世紀二十年代初在蘇聯托洛斯基所擁護的重工業的計劃和組織方式，葛蘭西把這種強調看作是美國資本主義的特徵。葛蘭西寫道，托洛斯基計劃的本質，

"就在於某種'超強'（因而不是合理化的）意志，這種意志將國家生活中至高無上的權力運用於企業和企業方法，用外部高壓去加強生產的秩序和紀律，並使習慣適應

5 「獄中札記」第2146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286頁（英文版）。

於工作的需要。如果提出一種將所有的與該傾向有關的問題都考慮在內的普遍方法，則它必定以波拿巴主義宣告終結。因此，就必將無情地推翻它...直接或間接地根據生產和工作的秩序制定強制性的紀律是正確的...但是，它所採取的這種形式則是錯誤的。"(6)

葛蘭西並未詳細說明美國的制度是否將以某種"波拿巴主義者"(Bonapartist)⁽⁷⁾專政形式宣告終結，也未說明在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避免向這一方向發展；但是，葛蘭西暗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規則同美國所實行的資本主義管理方式的區別存在於激勵社會主義勞動規則發展的意識形態中。"新的生產方式同一定的生活、思想以及經驗生活方式不可分割，不可能只在一個領域裡能取得成功而不在其它領域產生實際成果。"(8)

在整個「獄中札記」裡，無論葛蘭西在分析義大利歷史、批判克羅齊、討論政黨的職能，還是在討論統治階級的性質時，他都一直強調，任何重大的歷史變遷，任何一個傑出人物的出現都以精神和道德的改革，以人的意識的變革為標誌。同時，使他感到窘迫的就是他在以往政治實踐生活中所遇到的那個二難推理，即自由和紀律，個人自由和經濟及行政效率之間的辯證衝突。儘管他對現在和未來問題的討論差不多總是比

6 「獄中札記」第2146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301頁（英文版）。

7 波拿巴主義者：指19世紀擁護拿破崙一世和三世的人。曾於1852年分裂為保守、激進兩派，而在1891年隨著拿破崙一熱羅姆死後，波拿巴黨即不復存在。

8 「獄中札記」第2164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301頁（英文版）。

較模糊和抽象的，尤其因被囚禁而不能直接批判法西斯主義制度並為未來的革命制定藍圖，這使上述情形更為突出。但是，也許我們可以著手了解一下他在「獄中札記」裡怎樣提出了政治行動方法和政治分析方法，這一切使他在逝世後的數年裡對義大利的政治生活產生非常強烈的影響。

儘管葛蘭西表明他對法國歷史和政治擁有大量的知識，對英國和美國的文化也擁有相當透徹的見地，但他最為關心的仍是義大利，正是從義大利的過去，他抽取出詳盡的事例以證明他的歷史分析，在他對現實進行討論時，自然缺乏這類細節資料。但是，他的歷史研究，以及他對第三國際的直接經歷都表明，他總是注重國際影響和國際間的比較。諸如他相信，文化霸權既可以在國際範圍內實施，也可以在某一單個國家內，發生在組成該國家的不同力量之間，而且也發生在國際和世界領域，發生在國際和大陸文明的複雜因素之間。"⁽⁹⁾這個觀點，在歷史上考慮到了諸如十六世紀外國對義大利文化上的優勢；而且，儘管葛蘭西沒有十分清楚地表明，但由於他的經歷，他也考慮到了蘇聯對共產國際的領導作用。關於這個問題，葛蘭西提出了一系列疑問。像許多其他問題一樣，對這些問題，他也沒有提出答案。

9 「獄中札記」第1331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350頁（英文版）。

"一個國家對另一個的文化統治仍舊是可能的呢？或是這個世界已經在經濟和社會結構上如此地統一，以至於儘管一個國家可以'按年代順序'先發動變革，但卻不能在'政治上'保持壟斷，並以這種壟斷作為文化霸權之基礎呢？民族主義在今天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呢？它有可能成為經濟和金融的'帝國主義'而不能成為文明之'首'以及政治和經濟的文化霸權嗎？"(10)

人們很想知道，葛蘭西將怎樣估計二十世紀後半期美國和蘇聯各自的地位，或者，他對擁有核武器會說些什麼。

但是，正由於葛蘭西強調了義大利歷史的特殊面目，也由於他通過帕爾米羅·陶里亞蒂一直和義大利共產黨保持聯繫，義大利共產黨人便致力於解釋葛蘭西著作以作為其理論和策略的指導方針。使人感到驚奇的是，他對五十年前形勢的分析許多地方至今仍然適用：

"這種危機實際上表現為越來越難以組成政府，以及政府自身經常出現搖擺不定。這種危機的直接根源在於議會黨派的增加和這些黨派內部曠日持久的危機...這種現象的表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腐化和道德敗壞。黨的每一派別都認為自己擁有一貫正確的方法，以阻止整個黨的衰弱，並窮盡一切手段去爭取領導權，至少分享這一權力

10 「獄中札記」第1618頁（義大利文版）。

。正如在議會中各黨都確信它自己是唯一可以組成政府以拯救國家的政黨，或者如果它給某政府以支持，則它至少也要求盡可能廣泛地參與政府的權力作為回報；因此，斤斤計較，吹毛求疵的談判，必然要涉及到個人，直到對個人進行誹謗，並且這種談判經常是不講信譽、爾虞我詐的。實際上，也許個人似乎還不至於腐敗到這種程度，因為由於領導職能的衰退，使整個政治組織都已經腐敗了。"(11)

葛蘭西這段話意在說明本世紀二十年代法國的政治生活，但它卻成了對本世紀七十年代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狀況之維妙維肖的寫照。

同樣，由於舊的統治制度的崩潰，義大利共產黨人也可以聲稱他們正前進在建主自己的文化霸權的道路上。他們在許多地區的地方政府中已經取得了支配地位，由於他們不僅從組織起來的工人中，而且從許多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中尋求支持，因此義大利共產黨人似乎在極大程度上是按照葛蘭西所提出的路線來建立其文化霸權的。儘管當代共產主義者有時運用了葛蘭西的著作，但是，認為葛蘭西比馬克思提出了更好的指導革命的方法，或是為革命的成功提出了更好的答案 都將是錯誤的。像馬克思本人一樣，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更為關心的是達到對歷史、社會、經濟變革之性質的廣泛了解，以及對知識分子和政黨在這種變革中的作用的廣泛了解。此外，同許多

11 「獄中札記」第1639頁（義大利文版）。

革命的思想家及馬克思本人一樣，葛蘭西更為感興趣的是發動革命的漫長過程，而不是革命成功後社會將是什麼樣。葛蘭西既不想寫革命手冊，也不想描述未來的烏托邦。

葛蘭西對於馬克思主義同舊的知識分子以及舊的社會制度的關係深感興趣，當然，毋庸置疑，其中部分原因在於他對天主教的尊重，他了解舊的意識形態是多麼頑固以及克羅齊同馬克思主義的關繫，克羅齊為自己的目的去運用馬克思的方法對他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葛蘭西寫到："人們可以說，B. 克羅齊哲學著作的很大部分都代表著一種企圖，即吸收實踐哲學，並使它成為傳統文化的一個附屬部分。"⁽¹²⁾他認為，這既標誌著馬克思主義開始在傳統文化系統中實行其統治，也證明了舊制度的強大。葛蘭西認為（儘管他對克羅齊的運用很難證明這一點），雖然馬克思主義不需要任何外部支持，可"仍舊十分強大，尤其是不斷被加以凝煉和調色的傳統文化卻竭力像被征服的希臘一樣，最終又征服了粗暴的羅馬占領者。"⁽¹³⁾

正由於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和其它哲學之間的相互作用，認識到了文化的漸進性變化的重要性，才使得葛蘭西的著作對非馬克思主義者也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儘管像所有馬克思主義的真正信仰者一樣，葛蘭西本應否定這樣一種看法，即馬克思主義只是可供人們進行選擇的適合於他們的許多意識形態之一，但仍有人試圖從這種看法來看待葛蘭西的筆記。由於筆記內容的多樣性、零散性，人們可以從中找到支持葛蘭西的理論

中許多不同觀點的論述，同時也引出無數的問題。由於葛蘭西生活條件的限制，對這些問題，他也無法給出答案。他廣泛的興趣、非凡的閱歷、以及歷史和哲學文化知識，還有他的囚禁生涯——這一經歷使他的著作更具理論性——使他在馬克思主義者中享有獨一無二的盛譽。同時，由於他的思想仍根植於義大利和歐洲唯心主義文化傳統，因此，無論葛蘭西是如何反對這一傳統，維科、黑格爾、索萊爾和克羅齊對葛蘭西來說，在某種意義上同馬克思和列寧具有同樣的重要性。這一事實意味著非馬克思主義者同葛蘭西之間比二十世紀其它馬克思主義作家更容易進行對話。

在他的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時間裡，葛蘭西同義大利域外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聯繫，而他也許同他們有著更多的相同之處，但由於他最重要的理論著作是在他逝世許多年後才發表的，因此，人們幾乎沒有機會研究他的思想。葛蘭西似乎也沒受這些人多大影響。在「獄中札記」裡，除了列寧、托洛斯基、布哈林以及偶爾提到的史達林外，他所涉及的只不過幾個人。葛蘭西非常敬佩羅莎·盧森堡，她作為一位可以同基督教歷史上的殉道者相媲美的革命事業的殉道者，於1919年被殺害。但是，葛蘭西崇敬她，是把她作為探索革命方法的理論家而不是把她當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忠實倡導者。葛蘭西了解並對羅莎·盧森堡「論群眾罷工」的小冊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該書寫於1906年，但1919年才翻譯成義大利文，他也曾讀過盧森堡的一篇早期文章即「論蕭條」，還讀過「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一文，這篇文章在1928年用法文再版。在該文中，盧森堡提出

¹² 「獄中札記」第1435頁（義大利文版）。

¹³ 同上。

了一個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每一方面都是要根據政治實踐活動的策略需要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發展。葛蘭西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論斷以適應他的歷史變革的概念，他相信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是必然的，它將同時提高大眾文化水平以及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理解，同時，也使自身變得足夠精確，足夠成熟，以便使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正確性。葛蘭西同盧森堡一樣強調群眾自發支持革命的必要性，他認為1919年都靈工廠委員會運動就實踐了盧森堡關於如何發動革命的一些思想。

在葛蘭西那一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和他所致力研究的學說持有同樣看法的有匈牙利的喬治·盧卡奇和德國的卡爾·科西。儘管葛蘭西可能讀過盧卡奇的「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羅莎·盧森堡」和另外一兩本其它著作，但葛蘭西本人承認他僅僅很模糊地了解一點盧卡奇的著作。上述二人比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都更為清楚地認識到在解釋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時，文化和哲學因素的重要性。二者都承認並強調馬克思的思想中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因素。但葛蘭西並沒有像盧卡奇那樣致力於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和文學理論。由於他的生活條件及他的逝世，他擺脫了整個史達林時期存在於莫斯科的那種危機，因此，他的思想的確比盧卡奇更具有一致性，其思想範圍也更為廣闊。

在德國，本世紀二十年代初，卡爾·科西——一位大學法學講師，在同共產黨分裂之前，曾短暫地參加過共產主義者的活動——用一種理論方法闡述了某些觀點。葛蘭西曾試圖在工

廠委員會運動中實踐這些觀點。科西強調，社會化並不意味著中央集權，工廠委員會應成為所有真正的革命的基礎。儘管科西的著作在1961年他逝世後幾年裡被重新發現，但由於在美國十分可悲和令人沮喪的流放，使他成為徹頭徹尾的小宗派代言人。因此，儘管他的著作十分重要，但卻沒有產生葛蘭西那樣大的影響。葛蘭西同科西之間沒有任何接觸，事實上，到二十年代中期，由於科西同共產國際之間的爭論，他更為同情布爾迪加的處境而不是葛蘭西，因為科西和布爾迪加都似乎代表著抵制史達林和蘇聯共產黨操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企圖的少數派。

儘管葛蘭西是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並有著十分廣博的閱歷，但骨子裡仍是個義大利人。他繼承了自十九世紀安東尼奧·拉柏里奧拉開始的帶有義大利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葛蘭西是個孤獨的思想家，這起初是由於日常記者活動和政治工作的壓力，其後，是由於被捕入獄。正由於這一點，使「獄中札記」具有了新鮮感。人們可以感到，葛蘭西完全是自己從其所讀的形形色色的原著中，從自己的政治及個人生活經歷中得出他的結論的。即使他的思想同某些思想家接近，他也是根據自己的方法，在對所研究的著作做出批判和反應後，才得出同他們相近的結論。同早期好鬥的和出版腔調的文風相反，「獄中札記」具有超然性和沈思性，他這樣做是為了澄清他的思想，並將此作為他有生之年未能完成的宏大的、系統的著作的基礎。

儘管葛蘭西經常提出一些可以使馬克思主義和其它哲學進

行對話的方法，儘管他思想的許多方面都更加接近於霍克海默 (Horkheimer)、阿多諾 (Adorno) 和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 的批判哲學，而不是列寧或羅莎·盧森堡或喬治·

盧卡奇的教條主義體系，但是，如果認為葛蘭西主要是運用法蘭克福學派複雜而抽象的方法（在他們的著作中，很少引用具體的歷史事例）來關注社會學和認識論問題，那將是錯誤的。葛蘭西的抽象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其被囚禁和被迫脫離政治活動的結果。他的意識形態依然是行動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一直是一種"實踐哲學"。此外，他思想的基本結構，他感情和政治信仰的核心毫無疑問是馬克思主義的，如果說他曾設想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或是說他確實認為存在著某種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的哲學體系作為能夠令人信服地解釋或變革世界的基礎，那將是錯誤的。葛蘭西想使人們承認實踐哲學是生活的基礎，承認共產黨的文化霸權是國家之基礎。他所使用的方法比列寧或史達林所運用的方法更為人道，但不應該認為葛蘭西曾是一個準備在現存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中無限期工作的民主改良的社會主義者。他的後繼者談到同其它社會和政治力量達成"歷史的妥協"的必要性，但很難認為這種妥協不是策略手段。下面是對力量關係的具體分析所做的最重要的評述，因此，這是葛蘭西對馬基維利所做註釋中的最關鍵的一段：

"這類分析不能，也不應該以自身為目的（除非其目的僅僅是寫一段過去的歷史），只有用這類分析去論證某

種特殊的實踐行動或意志的推動力時，它才能獲得意義。它們揭示了阻力最小的地方，在這裡，意志力可以得到最有效的運用；它們提出了直接的策略行動；它們指出了如何最好地發起鼓動戰役；什麼語言最容易被群眾理解等等。在所有情況中，決定的因素是這樣一種力量，這一力量是經過長期組織和準備的，一旦形勢成熟就可以投入戰鬥...因而，根本任務就是系統地、耐心地保障這種力量的形式，發展並使其更為和諧、緊密、更為自覺。在軍事史上，軍隊在各種情況下都需要作好準備以便在任何時候都能夠投入戰爭。偉大的力量之所以恰恰是偉大的，就是因為它們隨時準備在有利的國際局勢中進行有效的干涉——而有利的國際局勢之所以恰恰是有利的，也是因為存在著對其進行有效干涉的具體的可能。"(14)

如果今天這種力量存在於義大利共產黨組織中，那麼，葛蘭西也會認識到發動一場成功的戰役就在於在正確的時間進行適當的聯合。

"為把經濟力量從傳統的政治束縛中，從某些力量（如欲創立一個新的和諧的，沒有內部矛盾的政治經濟歷史集團，就必須吸收這些力量）的政治方向的變化中解放出來，一種恰當的政治推動力總是必要的...儘管為了擊毀第三種力量，就有必要把兩力聯合起來，但是求助於軍隊和

14 「獄中札記」第1588-1589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185頁（英文版）。

高壓（即使設想這是有益的）不是爲了別的，只不過是一種方法上的假設，因爲武力可以被用來反對敵人，但卻不能用來反對自己陣營中的人——對這部分人，我們希望迅速地進行同化——因此，唯一具體的可能就是妥協，並且也需要‘好心眼’和熱情。”⁽¹⁵⁾

葛蘭西一直相信，共產黨需要儘可能寬廣的基礎。正如他在1923年所設想的，黨可能實現同農民的聯合，也可以希望贏得一些知識分子和一些小資產階級的支持，但黨仍舊是共產黨。葛蘭西是維科的一個很好的學生，因而，他不能不意識到那個歷史的諷刺，他懂得這樣一種方法，依據這種方法，人們根據自己的意願、自己的經歷以及無法預見的經濟制度的變化來規定自己的觀念和目標。“我們知道已經發生了什麼和什麼將不會發生，不能發生的就是‘非存在’，而根據定義‘非存在’是不可知的。”⁽¹⁶⁾他本應該準備遵循一條特殊的義大利路線去觀察義大利共產黨，而不是盲目摹仿適用於其它地方的策略和方法。他本會對其逝世後資本主義體制所表現的生存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由於他的逝世，這一切都將無法實現了。

但是，葛蘭西從未想成爲一個預言家，把他的著作當作可以爲我們預見未來的先知的格言是無效的。我們將閱讀葛蘭西的「獄中札記」、那些無與倫比的獄中來信、甚至還有他的新聞文章，以增加我們對過去的理解，由此，我們才能更好地洞

15 「獄中札記」第1612-1613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168頁（英文版）。

16 「獄中札記」第1404頁（義大利文版），「獄中札記選」第438頁（英文版）。

察未來。但是，我們閱讀葛蘭西的著作，更是因爲他的著作是我們這一時代裡一個非凡的知識分子的著作，他的生平及思想表明，人類的意願如何可能超出歷史和個人環境的限制。自相矛盾的是，這位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作家，也是人類精神獨立於其物質條件限制的最典型的範型。

葛蘭西年表

- 1891年 生於撒丁島，卡利亞里省，阿萊斯 (Ales) 村。父，弗朗西斯科·葛蘭西 (Francesco Gramsci)。母，米瑟皮娜·瑪恰斯 (Ginseppina Marcias)。葛蘭西排行第四。
- 1903年 上小學時，被迫輟學並到吉拉查 (Ghilarza) 地產登記所工作。其父被指控犯有瀆職罪被捕入獄，此後，其母遷至吉拉查。
- 1905 - 1911年 在桑圖利蘇和卡利亞里上中學。
- 1911年 獲都靈大學獎學金，並進入該校學習。
- 1913年 目擊以全民投票選舉為基礎的撒丁第一次議會選舉。第一次在都靈同社會黨接觸。
- 1914年 開始為社會黨報「人民之聲」供稿。由於健康原因休學繼而失學。
- 1916年 開始正式為社會黨報「前進」撰稿。
- 1917年 8月，俄國蘇維埃代表團參觀都靈，葛蘭西參與組織工作並且越來越積極地為社會黨工作。
- 1919年 成為「新秩序」報奠基者之一和日常撰稿人。積極參加工廠委員會活動。

- 1920年 大罷工。9月，參加占領工廠。
- 1921年 1月，義大利社會黨里窩那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該黨分裂並產生共產黨。葛蘭西為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 1922年 6月，作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到達莫斯科。在莫斯科附近一診所度過幾個月，在此遇到米麗雅·舒赫特，後來米麗雅成為他的妻子。
- 10月，法西斯主義者"逼近羅馬"，墨索里尼組閣。
- 1923年 12月，被第三國際派往維也納。
- 1924年 4月，被選為維尼托（Veneto）選區代表。
- 5月，重返義大利。
- 6月，瑪泰奧蒂被害。參加議會阿文汀會議，11月，共產黨代表的定重返議會，同法西斯主義者進行鬥爭。
- 1925年 3-4月，在莫斯科召開第三國際執行會議。
- 5月，在議會發表演說，反對禁止秘密結社法。
- 1926年 1月，參加義大利共產黨在法國里昂舉行的代表大會並發表演說。
- 10月8日，在羅馬被捕。12月，解往烏斯蒂卡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
- 1927年 1月，被轉送到米蘭監獄。
- 1928年 解往羅馬受審。

- 6月，被判監禁二十年。送往都里（巴瑞（Bari））特別刑事機構。
- 1929年 著手寫第一部「獄中札記」。
- 1931年 8月，嚴重出血。
- 1933年 3月，病情惡化。經醫癢診斷和國際聲援（12月）轉入弗米亞一家私人診所。
- 1935年 8月，轉入羅馬的奎斯撒那（Quisisana）診所。
- 1937年 4月27日，腦出血後逝世。